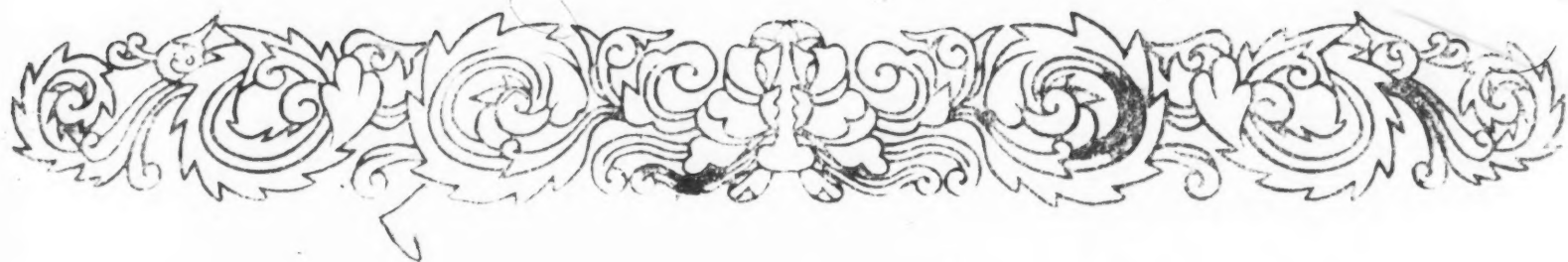




政法研究

1



政法研究

一九六〇年 第一期目录

社論：更高地举起毛澤东思想的紅旗，保障社会主义

建設的繼續跃进 [1]

社論：欢庆中苏同盟十周年 [3]

談談政法工作者的世界觀問題 李 群 [5]

学习毛澤东同志“新民主主义論”一文的体会 史 群 智 [10]

对我国工农联盟問題的学习体会 韦 德 [17]

發揮审判工作职能，为两条道路斗争服务 戴 福 康 [23]

駁“阶级斗争熄灭”論和“专政消亡”論的觀點 王 云 生 [27]

批判资产阶级刑事訴訟的“辯論原則” 沈 齐 思 [30]

和平共处五項原則的进一步发展 立 平 [35]

坚决反对美日反动派进行軍事勾結
——中国政治法律学会致电支持日本人民斗争(电报全文) [37]

日美軍事同盟条約是对亚洲和世界和平的严重威胁 傅 毅 [38]

日本法律工作者訪华代表团归国声明 [43]

国际民主法律工作者协会通告 [45]

国际民主法律工作者协会执行局會議(記錄摘要) [47]

政法研究

(双月刊)

1960年 第1期

2月2日出版

編輯者 政法研究編輯委员会 总发行处 北京市邮局
北京东城区王明胡同3号
電話：4.4351

出版者 法律出版社 訂 購 处 全国各地邮电局
北京东城区十二条老君堂9号
電話：4.3851

印刷者 北京新华印刷厂 代訂零售处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定价：每册 0.30 元

上期实际出版日期 12月15日

社論

更高地举起毛澤东思想的紅旗 保障社会主义建設的繼續跃进

目前全国已經掀起一个学习毛澤东思想运动的高潮。展开学习毛澤东思想的运动，掌握毛澤东思想的武器，对我们全体政法工作者来说，当然是极端重要的。

毛澤东同志思想最主要的特色，就是善于把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随着革命斗争条件的变化和发展，创造性地发展了馬克思列宁主义，正确地解决了中国革命和建設中所提出的各种理論和实际問題，引导中国人民从一个胜利走向又一个胜利。

以毛澤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决定了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事实証明：当着革命是在毛澤东同志思想指导之下，是以毛澤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之下，革命就胜利；当着革命脱离了毛澤东同志及其思想的指导时，革命就失败、就后退。如果不是毛澤东同志领导着在同各式各样錯誤路綫的斗争中取得胜利，如果中国革命不是在毛澤东思想旗帜下前进，也就沒有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

以毛澤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决定了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設的胜利。毛澤东同志创造性地解决了在我国具体条件下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一系列的带根本性的問題；并根据我国社会主义建設的經驗而正确地提出了党的建設社会主义的总路綫，定下了一套“同时并举”也就是“两条腿走路”的方針。在毛澤东同志倡导下組織起来的人民公社，不仅是加速我国社会主义建設的有力武器，而且是我国将来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好的社会組織形式。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的偉大胜利，我国大跃进的偉大成就，都是和毛澤东同志的领导分不开的。

我們为了使工作做得更好，每个同志都要认真学习毛澤东同志的思想。学习他把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榜样，他善于运用馬克思列宁主义来分析和解决和中国革命和建設中的問題，不論問題怎样复杂，他总是分析得那样深刻，解决得那样透彻。学习他把严肃的原則精神和生动的独創精神相结合的榜样，不論是在对敌斗争中，或是在党的原則斗争中，他总是坚决地捍卫了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他把革命发展阶段論和不断革命論相结合的榜样，不論在革命和建設中，他都善于及时提出新的革命任务，使干部和群众經常保持飽滿的热情，从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学习他坚持群众路綫，重視調查研究，多謀善断的榜样，他时时刻刻虛心向群众学习，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处处从群众的利益出发。学习他以冲天的干劲，大无畏的精神，坚决克服各种困难，为真理而奋斗的榜样，他在复杂尖銳的斗争中，总是和群众一起，排除万难，坚定不移地奋勇前进。学习他团结全党，团结全民，諄諄善誘，誨人不倦的榜样，他善于团结群众，教育干部，使全党的团

結堅如磐石，使全國人民親如一家，從而保證了革命事業的勝利前進。總之，我們要好好學習他的思想和著作，把它運用到我們實際工作中去。

毛澤東同志的著作很多，內容非常豐富，包括了各方面的理論和學說。我們政法工作者必須學習整個毛澤東思想，學習全部毛澤東同志的著作。毛澤東同志關於國家和階級鬥爭的學說只是整個毛澤東思想的一個組成部分。我們要掌握毛主席關於國家和階級鬥爭的學說，必須學習整個毛澤東思想。

馬克思列寧主義是戰鬥的科學，我們也應當在戰鬥中學習它。毛澤東同志的著作堅持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學說的戰鬥性的特色，過去現在和今後都是我們反對修正主義及各種資產階級思想的最銳利的武器，我們政法工作者必須認真掌握毛澤東思想的武器，進一步批判修正主義的國家論與法律觀及各種資產階級法律思想。

政法工作具有鮮明的黨性和階級性，是人民的強有力的專政的武器。政法工作必須在黨的絕對領導下，大走群眾路線，與勞動生產相結合，為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服務。要完成這樣的任務，就必須認真學習毛澤東同志的思想和著作，如果不以毛澤東思想武裝自己，不認真學習毛澤東同志的著作，就要犯根本性的錯誤。必須特別強調指出，認真地、有計劃地、密切結合實際地學習和研究毛澤東同志的思想和著作，是我們政法工作者的一件頭等重要的事，任何輕視和忽視，都是極端錯誤的。

目前，全國人民在黨的領導下正為進一步貫徹黨的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轰轰烈烈而又踏踏實實地推動着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繼續全面地躍進。政法工作必須適應這種總的形勢。這就要求政法工作者進一步學習毛澤東同志的思想和著作，堅持毛澤東思想的方向。我們相信，只要我們更高地舉起毛澤東思想的紅旗，堅決貫徹總路線的精神，就一定能夠把政法工作推向一個新的躍進的階段。

我們必須認真地持久地學習毛澤東同志的思想和著作，用以武裝我們的頭腦，指導我們的工作。我們全體政法工作者應在當地黨委統一領導下，掀起學習毛澤東同志的思想和著作的熱潮，使我們政治思想水平跟上社會主義建設一日千里的发展形勢，把工作做得更好，保障和促進社會主義建設的繼續躍進。

社論

欢庆中苏同盟十周年

1950年的春天，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約訂立了，这是一个具有偉大历史意义的事件。十年来，偉大的中苏同盟显示了它无比强大的力量，正如我国党和国家领导人致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賀电所說的：“它对于中苏两国的繁荣和維护世界和平、促进人类进步的事业，已經發揮并且还将繼續發揮巨大的影响。”

偉大的中苏同盟，它是以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建筑在根本利益和共同目标完全一致的基础上的新型的、高級的国际关系。是掌握了政权的无产阶级完全新型的同盟关系，它体现了中苏两国人民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与爱国主义相統一的精神，反映了人类的长远利益和最崇高的理想，因之，它具有无限的生命力，有不可战胜的力量。历史确凿地証明了毛澤东同志的英明論断，由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約固定下来的中苏两国的团結“不但必然要影响中苏两大国的繁荣，而且必然要影响到人类的将来，影响到全世界和平与正义的胜利”。

十年来，在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約的基础上，中苏两国进行了政治、經濟、文化科学技术等各方面的互助合作，并取得了偉大的成就。在工业方面，在第一个五年計劃期間，苏联帮助我国建設了一百六十六个規模巨大的建設項目，成为我国第一个五年計劃期間工业建設的核心和骨干；根据1958年和1959年中苏两国簽訂的协定，苏联还将帮助我国建設一百二十五个工业項目。在科学文化方面，苏联派遣了大批优秀科学家帮助我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設，并促进了我国的科学研究工作的发展。我国人民衷心感謝兄弟的苏联人民的深情厚誼。

十年来，两国的建設事业获得了共同的繁荣和高涨。近年，益发令人振奋的是：苏联更在加快步伐进行規模宏偉的共产主义建設，七年計劃的偉大指标正在一步步地实现；我国人民在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在取得了第一个五年計劃巨大胜利的基础上，依靠着社会主义建設总路綫、大跃进的发展速度和人民公社的組織形式这三件法宝，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設正在連續跃进。社会主义陣营其他各国也都在以資本主义国家所望尘莫及的高速度进行着社会主义建設。按人口平均計算，社会主义世界的工业和农业的平均水平，都已經超过了資本主义世界的平均水平。在最重要的科学技术領域內，苏联已將資本主义世界最发达的美国远远地抛在后面，人造卫星和宇宙火箭的上天，为人类征服宇宙开辟了新紀元。全世界人民可以看到：社会主义制度日益显示出它无限的青春力量，它似旭日东升；而資本主义制度却是日薄西山，气息奄奄。

中苏两国共有人口八亿五千万，占世界人口三分之一，我們有辽闊的疆土，丰富的資源。中苏两国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一起，結成了强大的社会主义陣营，中苏同盟是社会主义陣营的基石，它有力地促进了世界的社会主义事业。中苏同盟是世界和平的强大堡垒，它有力地打击了帝国主义战争狂人的气焰，大大地鼓舞和支持了世界上一切被压迫人民和民族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殖民主义、爭取民族独立和民主的斗争，它是保卫世界和平的中流砥柱。

在五十年代里，和平与战争势力之間进行了反复的严重的斗争，斗争局势显明地表明了东风已经压倒了西风，并且将继续压倒西风。十年来，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侵略集团，不断地在世界各处进行挑衅，穷凶极恶地先后在朝鲜、印度支那、柏林、匈牙利、台湾海峡地区，在苏伊士运河地区、叙利亚、黎巴嫩、约旦、伊拉克、古巴以及其他地方，曾一再发动武装侵略和战争挑衅。由于有强大的中苏同盟存在，对粉碎帝国主义侵略行为和战争挑衅起了很大的作用，有力地捍卫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安全，大大地支持了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民族民主运动，保卫了世界和平。

中苏同盟无敌于天下，坚如磐石的、越来越强大和巩固的中苏同盟已成为帝国主义侵略和战争政策不可逾越的障碍，因之，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帝国主义集团和它的工具现代修正主义者十分仇视中苏之间的团结，他们妄想消灭中国，消灭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他们千方百计地企图破坏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之间的团结特别是中苏之间的团结，梦想在团结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中苏同盟间找寻裂缝，但是，事实与他们的愿望正相反，以中苏团结为核心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越来越巩固，1957年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通过的莫斯科宣言，是社会主义阵营团结的宪章。在莫斯科宣言的鼓舞与指引下，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更加强了。帝国主义侵略集团和现代修正主义者的妄想和阴谋，其结果只能是在团结一致的社会主义阵营面前碰得头破血流。

由于社会主义力量、民族革命力量和平民主义力量压倒了帝国主义战争势力，帝国主义制造的国际紧张局势出现了某种程度的缓和，因之，美帝国主义也不得不作出一些和平姿态，企图欺骗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们，麻痹人们的斗志。但是，我们不能不警惕地看到这样的一些事实，就是：他们一方面口吐和平词令，一方面却在加紧扩军备战，大力发展洲际导弹，到处建立和扩大导弹基地，积极加强和拼凑军事集团，并且扬言随时恢复核武器试验。美帝国主义在西方加紧复活西德军国主义；在东方，加紧复活日本军国主义。今年1月19日，美国政府和日本岸信介政府不顾中苏两国的警告，不顾日本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反对，签订了日美军事同盟条约，这是旨在复活日本军国主义，准备向中国、苏联和亚洲其他国家进行侵略和准备新战争的军事条约，这是对中苏两国和亚洲人民和平与安全的严重挑衅，它遭到包括日本人民在内的全世界人民的坚决反对。早在十年前，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第一条就开宗明义地写道：“缔约国双方保证共同尽力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以期制止日本或其他直接或间接在侵略行为上与日本相勾结的任何国家之重新侵略与破坏和平”。美日反动派如果胆敢步东条英机之后尘，其后果必然是玩火自焚。美帝国主义在和平的烟幕下积极进行扩军备战，这是极为阴险的，必须引起我们严重的警惕。全世界人民必须更进一步团结起来，为彻底粉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战争阴谋而斗争！

中国人民深刻理解中苏团结的重大意义。我们永远记住毛主席的教导：“中苏两国人民的团结极为重要，这两国人民团结一致了，世界人民的团结就不困难了。”（见1950年10月5日人民日报）中国人民将不遗余力地加强中苏两国的伟大团结，把巩固和发展中苏两国以及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当作自己最神圣的国际义务。我们深信，在六十年代，中苏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科学技术各方面的友好合作，将取得更为光辉的成就，伟大的中苏同盟在维护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的崇高事业中将作出更大的贡献。

談談政法工作者的世界觀問題

李 群

現在，全國各地掀起了學習毛主席著作的熱潮，我們政法工作者當然也毫不例外地投入了這個學習運動。革命的實踐已經充分證明，認真地系統地學習毛澤東思想，是提高全黨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水平、使我國革命運動從勝利走向勝利的關鍵。建國十年來，政法戰綫上的巨大成績，就是在毛澤東思想的光輝照耀下取得的。

我們的政法機關一直是在毛澤東思想的指導下，根據黨的政法工作路綫來進行工作的，在工作中不斷地與各式各樣的資產階級觀點進行了鬥爭。在土地改革、肅清反革命、三反五反等歷次運動中，特別是在司法改革運動、整風運動和反右派鬥爭中，對於資產階級的世界觀和資產階級的政治法律觀，進行了系統的嚴肅的揭露和批判，從而以無產階級的世界觀和無產階級的政治法律觀武裝了廣大政法幹部，成為一支無產階級專政的堅強隊伍。但是，也還有一些政法幹部，在他們的頭腦里，資產階級政治法律觀的殘余影響還還沒有完全肅清，資產階級的世界觀還還沒有得到徹底的改造。因而當社會主義建設飛躍發展，社會主義革命更加深入，資本主義和個體經濟制度殘余面臨最後滅亡的新的歷史時期，作為階級鬥爭最尖銳、最集中部分的政法戰綫，反映當前階級鬥爭的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兩種世界觀、兩種政治法律觀的鬥爭，再一次突出地表現出來。

毛主席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中指出：“在我國，雖然社會主義改造，在所有制方面說來，已經基本完成，革命時期的大規模的急風暴雨式的群眾階級鬥爭

已經基本結束，但是，被推翻的地主買辦階級的殘余還是存在，資產階級還是存在，小資產階級剛剛在改造。階級鬥爭並沒有結束。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鬥爭，各派政治力量之間的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在意識形態方面的階級鬥爭，還是長時期的，曲折的，有時甚至是很激烈的。無產階級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觀改造世界，資產階級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觀改造世界。”

經過1957年的反右派鬥爭和1959年的反右傾鬥爭，使我們更加深刻地体会到毛主席這種英明預見的正确性，他給我們以思想武器，使我們能够識別各種表現形式的階級鬥爭。社會的現實生活正如毛主席所分析的那樣。本來，在政法戰綫上所爭論的一些問題，都是一些經過不知多少次的批判和鬥爭的老問題，為什麼總是有人用這些屢試屢敗的舊貨來同黨較量勝負呢？我們政法工作者已經經過多次運動的鍛煉，受過長期的教育，為什麼有些同志總還沒有或不願意拋棄資產階級的政治法律觀點呢？最根本的問題，就是因為他們資產階級的世界觀沒有得到徹底的改造，無產階級的世界觀沒有鞏固地樹立起來。因而，他們在某些問題上思想可能明确了，但是遇到另一些問題，資產階級的政治法律觀點又要暴露出來。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那樣：“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他們的思想意識是一定要反映出來的。一定要在政治問題和思想問題上，用各種辦法頑強地表現他們自己。”因此，要徹底肅清資產階級的政治法律觀，就必須徹底改造資產階級的世界觀，樹立無產階級的世界觀，這是一個

艰巨的任务，但又是一个必须完成的任务。

在政法战线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种世界观的斗争，集中地表现在要不要无产阶级专政，要不要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政法工作要不要大走群众路线这三个根本问题上。

无产阶级世界观是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以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观察社会，便是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国家的学说，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任何国家都是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的专政，资产阶级国家是少数资产阶级压迫和剥削广大劳动人民的工具。只有推翻了资产阶级的专政，无产阶级才能获得解放；为了建成社会主义，走向共产主义，必须在推翻资产阶级的反动专政以后，建立起强有力的无产阶级专政。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一书中明确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与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横着一个从前者进到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过渡时期，而这个时期的国家则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我们的国家所以能够在短短的十年期间，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方面获得如此巨大的成就，从而根本改变了我们祖国的面貌，就是因为我们的党根据马克思主义这条根本原则，在推翻了国民党的反动政权以后，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是无产阶级专政。毛主席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指出：“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个专政必须和国际革命力量团结一致。这就是我们的公式，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经验，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纲领。”

无产阶级专政包括对人民实行民主和对敌人实行专政两方面。毛主席说：“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毛主席：“论人民民主专政”）只有在人民中充分发扬民

主，才能对敌人实行最有力的专政；也只有对敌人采取无情的专政，才能保障广大人民的民主权利。政法机关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组成部分，政法机关的总任务，就是镇压敌人，惩罚犯罪，保护人民，而且应当把专政的锋芒对准那些破坏、反对社会主义的反动阶级、反动派和反革命分子，对他们实行无情的镇压。毛主席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指出：“军队、警察、法庭等项国家机器，是阶级压迫阶级的工具。对于敌对的阶级，它是压迫的工具，它是暴力，并不是什么‘仁慈’的东西。”“我们对于反动派和反动阶级的反动行为，决不施仁政。”专政本来就不是什么仁慈的事情，在阶级存在的条件下，专政是不可避免的，不要无产阶级专政，就是要资本主义复辟。

有些人往往从超阶级的观点出发，片面地强调“民主”、“法制”，而不谈“专政”，他们不了解政法机关是专政的工具，不了解政法机关的首要任务是对革命的敌人实行专政，而认为“政法机关是保证民主的环节”，认为“政法机关的主要任务是保障人民的权利”，这种观点实质上是资产阶级世界观、资产阶级政治法律观点的反映。

资产阶级从他们的阶级利益出发，总是想尽办法打起所谓“全民”、“民主”的幌子，来掩盖资产阶级专政的阶级实质，来麻痹工人阶级，缓和、阻碍工人阶级的革命斗争，以维护资产阶级的统治。在社会主义国家里，这些所谓超阶级的反动观点，又成为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武器，他们竭力宣扬这些陈腐的反动观点，把民主和专政对立起来，说什么专政会“妨碍民主”，并且借口“民主”来反对我们对敌人实行专政，企图把专政的锋芒转向人民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以改变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性质，阴谋复辟资本主义。

政法工作要不要共产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和无产阶级世

界觀、資產階級世界觀鬥爭的根本問題。任何統治階級對於政權的領導，都是通過統治階級的政黨或代表來實現的。資產階級專政是通過資產階級的政黨來實現的，無產階級專政也必須通過自己的先鋒隊——共產黨來實現。列寧曾嚴厲地批判過那種把無產階級專政和共產黨專政對立起來的謬論，他說：“單從提出‘是黨專政，還是階級專政？……’這一問題的事實來看，就可知道人們思想糊塗到了極端不可思議，無可救藥的地步。……誰也知道，在大多數情形下，至少是在現代文明國內，階級通常是由政黨來領導的；政黨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響、最有經驗、被選出擔任最負責職務而稱為領袖的人們所組成的多少固定的集團來主持的。這都是起碼的常識。這都是簡明的事實。”（列寧：“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毛主席在很早以前就已經指出：“領導中國民主主義革命和中國社會主義革命這樣兩個偉大的革命到達徹底的完成，除了中國共產黨之外，是沒有任何一個別的政黨（不論是資產階級的政黨或小資產階級的政黨）能夠擔負的。”（毛主席：“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劉少奇同志也說過：“事情很明顯：如果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階段，我國的農民和民族資產階級離開了無產階級的領導尚且不能取得勝利，那末，在社會主義革命階段，除開無產階級以外，還有別的什麼社會力量能夠負起這種領導責任呢？要是沒有無產階級的堅定的、有遠見的和大公無私的領導，就是貧苦的農民也不可能走上真正社會主義的道路，更不必說本性同社會主義完全相反的資產階級了。”（劉少奇：“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向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政治報告”）共產黨是無產階級專政的核心力量，是無產階級專政和社會主義的根本保證。沒有共產黨的領導，便不可能有無產階級專政，也就不能進行社會主義建設。因此，黨的領導，是有關我們國家政權的根本問題，是有關我們人民民主

制度生死存亡的問題。我們國家的一切組織和工作都必須在黨的領導下。政法機關是無產階級專政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就更必須置於黨的領導之下。政法機關如果不在黨的領導之下，就不可能擔負起鎮壓敵人、保衛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順利進行的任務。

中國共產黨在國家生活中的領導地位，在憲法中已有明確的規定。但是有些同志認為黨對政法工作只能原則領導，而不能具體領導；或者認為只受黨中央的領導，而不能受地方黨委的領導。這實質上就是向党鬧獨立性。這種觀點就是資產階級所謂“司法獨立”的翻版，是資產階級政治法律觀點的具體表現。資產階級宣揚什麼“三權分立”，把司法機關描繪成為一副超階級的樣子，其目的就是為了掩蓋司法機關的階級實質，把自己說成似乎是“公正”的，以欺騙廣大勞動人民，維護自己的剝削統治。我們知道，國家權力是不可瓜分的，資產階級的所謂“三權分立”，實質上只不過是統一地執行資產階級統治的一種分工形式，而資產階級國家司法機關是在這種分工形式下的鎮壓勞動人民的工具。

黨對政法工作的領導必須是全面的、絕對的。政法機關不但要服從黨中央的領導，而且要服從地方黨委的領導；不但要在政策原則方面服從黨的領導，而且要在業務方面服從黨的領導。因為只有黨委才最清楚地了解整個政治形勢，所以只有在黨委的絕對領導之下，才能把工作做得好，把案件處理得正確，從而有利於當前的對敵鬥爭。十年來，政法工作所以能夠取得偉大的成績，難道不正是因為堅持了黨的領導嗎？事實證明，哪里的政法機關如果企圖離開黨的領導，向党鬧獨立，就一定要犯原則性的大錯誤。

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世界觀不同，群眾觀也不同，因而對於群眾運動的態度也就根本不同。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政黨，它代表着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一切工作都是為

了群众。共产党人认为，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枷锁是要靠人民群众自己的双手来粉碎，幸福生活要靠人民群众自己的双手来创造。共产党人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向来是满腔热情、积极领导的，所以群众路线是我们一切工作的根本原则，是党的根本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政法工作当然也毫无例外地必须贯彻群众路线，为群众运动服务。我们的政法机关是人民手中的刀把子，是对敌人实行专政的工具，只有彻底地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才能对敌人实行有力的专政，发动群众越彻底，作为人民民主专政组成部分的政法机关也才越坚强有力。

在资产阶级看来，社会历史是少数“英雄人物”的历史，人民群众在他们眼中是“愚蠢”的，是“群氓”。资产阶级在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时期，虽然也曾利用过群众，但是当人民群众真正起来的时候，他们便反过来镇压群众运动，他们对于革命的群众运动是极为仇视的。所以我们说，对待革命群众运动采取什么态度，是资产阶级革命家和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根本区别。资产阶级国家的政法机关，是资产阶级压迫广大人民群众的工具，它和广大人民群众是对立的，在工作中不可能依靠群众、走群众路线，这是由它的阶级本质决定的了。）

有些同志在口头上虽然也不反对政法工作中的群众运动，但是他们是持有保留条件的。譬如说，有人认为在全国解放初期，政法工作可以采取群众运动，但是当反革命基本肃清以后，政法工作便不需要采取群众运动了，而主要应当依靠“法制”了。这种把“法制”同革命的群众运动对立起来的观点，正是资产阶级政治法律观的反映。又譬如说，有人口头上也赞成在政法工作中贯彻群众路线，采取群众运动，但是当群众真正发动起来了，看到运动中出现了某些不可避免的、局部的、暂时的缺点时，就大惊小怪，品头论足，进而对政法工作上的群众运动的

方针发生怀疑和动摇。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革命的群众运动不是绣花，在汹涌澎湃的群众运动中，出现一些缺点是不可避免的。怕出缺点就不敢放手发动群众，或者看到缺点就否定群众运动，不管他们口头上讲得如何好听，但实际上都是革命群众运动的反对派。

我们共产党人认为，一切工作，一切组织，在任何时候，都必须密切联系群众，坚持群众路线，放手发动群众。不但在全国解放初期，政法工作采取了群众运动，就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反革命分子基本肃清以后，仍然需要采取群众运动。政法战线上的“安全运动”，就是政法工作群众运动在新的条件下创造的新形式。在审理某些案件时采取大鸣大放、大辩论放手发动群众的做法，也是政法工作在贯彻群众路线方面的新发展。在广大居民中组织调处委员会和订立爱国公约，是我国政法工作的一个群众性的创造，是人民群众自我教育、自我监督、自我约束，运用自己的力量解决自己的问题的良好形式。公安机关普遍开展爱民月运动，是我国公安工作大走群众路线的一个新创造。公安机关除了经常注意联系群众，接受群众的监督外，通过这样一个运动，全国公安人员广泛地征求群众意见，集中地开展自我批评，改进作风，并且主动地为人民群众大办好事，这样就使公安机关进一步得到群众的监督和支持，充分显示了人民警察的本质。1958年以来，由于大搞“安全运动”，大批预防措施，人人当公安员，因而社会秩序空前良好，有力地保障了社会主义的建设。

政法工作人员参加劳动生产，是彻底改造思想、密切联系群众的重要方针。政法工作要同劳动生产相结合是我们党的一贯方针，从1958年以来，这个问题已提高到方针、路线的高度。政法工作人员参加劳动生产，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和人民群众共同劳动，有利于改造思想，克服三风五气；另一方面，可以和人民群众建立密切联系，

人民群众才会从心眼里把政法工作人员看成是他们的自己人，因而可以使我们的工作进一步地得到群众的积极支持。同时，当全国人民在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为工农业生产大跃进而奋勇苦战的时候，我们政法工作人员参加劳动生产，就可以懂得生产过程，掌握生产中的问题，更好地为生产建设服务。

改造资产阶级世界观，是政法战线上每一个工作人员的首要课题。剥削阶级出身、学过旧法的同志固然需要改造资产阶级世界观，就是工农出身的老干部、老党员或者解放后培养出来、没有学过旧法的青年同志，也有改造资产阶级的政治法律观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必要。因为我们是从旧社会来的，是生活在阶级社会中，资产阶级的世界观，资产阶级的政治影响，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习惯势力，对于社会主义的抵触和反抗，不能不反映到无产阶级的队伍中，不能不影响我们党内的不坚定分子。列宁说过：“资产阶级社会的死尸，……是不能装进棺材、埋到地下的。被打死的资本主义会在我们中间腐烂发臭，败坏空气，毒化我们的生活，从各个方面用陈腐的死亡的东西包围新鲜的、年轻的、生气勃勃的东西。”（列宁：“给美国工人的信”）如果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彻底改造，那么就必然会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治法律观点发生抵触。世界观就是对于整个世界、整个社会的一个总的看法，是贯穿在一切事物上的根本观点。资产阶级的政治法律观，就是资产阶级世界观在对待政治法律问题上的表现。因而抱有资产阶级世界观的人，不管他是否学过卢梭的“民约论”，不管他是否学过国民党的“六法全书”，由于他从资产阶级的观点出发，就必然要同无产阶级的政治法律观相对立。

彻底改造资产阶级世界观，巩固地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是每一个干部的任务，而对于我们政法机关干部来说，尤为重要。因为政法机关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组成部分，是同社会主义的敌人直接进行斗争的机关，如果这个专政的刀把子不是掌握在绝对服从党的领导、对社会主义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忠心耿耿的干部手中，而是掌握在坚持资产阶级世界观的人们的手中，其后果的严重性是可想而知的。同时我们还必须认识到，世界观的改造问题，并不是轻而易举短期即可奏效的，而是一个长期的艰巨的斗争过程。随着革命事业的不断发展和深入，我们的思想也就必须不断地加以改造。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就已经指出：“为了充分适应新社会的需要，为了同工人农民团结一致，知识分子必须继续改造自己，逐步地抛弃资产阶级的世界观而树立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的世界观。”

要改造世界观，就必须认真学习毛主席的著作。从前面我们提到的一些问题中可以看出，毛主席在有关我们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些重大问题上，都是作过精辟的阐述和详尽的指示的。但是我们有些同志并没有认真地学习毛主席的著作，或者虽然阅读过，但并没有把毛主席的思想作为一种武器，来改造自己头脑中的资产阶级观点，所以他们不是在这个问题上犯错误，就是在那个问题上犯错误。因此，我们每一个政法工作人员都必须在这次反右倾斗争胜利的基础上，认真地系统地深入学习毛主席的著作，在学习中，必须联系自己的思想实际，下苦功改造资产阶级世界观，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使自己成为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坚强战士。

学习毛澤东同志“新民主主义論” 一文的体会

史 群 智

(一)

毛澤东同志的“新民主主义論”，发表已經二十周年了。“新民主主义論”是我們党在民族民主革命阶段的行动綱領，也是我們党关于中国革命和中国建設的完整理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毛澤东同志把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結合的极为光輝、极为卓越的典范，是一部具有偉大意义的經典著作。

“新民主主义論”的发表，正值抗战时局处于非常严重的时期。当时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对国民党从政治經濟等各个方面进行誘降，妥协空气、投降危險达到了頂点。蔣介石反动集团为了扫清投降道路上的障碍，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頒布了“限制異党活动办法”、“共党問題处理办法”、“处理異党問題实施方案”等一系列反共文件，在軍事上調兵遣将进攻陝甘宁边区以及山西西部、太行区等根据地，在政治思想战綫上則叫囂“收起”共产主义，鼓吹“一个主义”（即大地主大买办阶级的专制主义）以及所謂一切革命都包括在三民主义中的“一次革命論”。与此同时，民族資产阶级則幻想建立資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向何处去”？又成为全国人民的普遍关切的問題。此外，我們党內在抗战初期出現的右傾机会主义虽已基本克服，但尚未彻底肃清其影响。毛澤东同志的“新民主主义論”就是在这种錯

綜复杂而又万分紧要的关头发表的。它为中国人民明确了奋斗目标，指出了光明的前途，有力地揭露与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妥协投降的阴谋，駁斥了“資产阶级专政”的反动論調，消除了党内右傾机会主义的影响，从而剥夺了国民党及其追随者的精神武装。这样，就极大地帮助了革命人民思想的統一，极大地加强了中国革命力量，保证了革命的胜利。

(二)

在这篇巨作中，毛澤东同志以辯証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的方法，全面地分析了中国历史的特点，指出自从外国資本主义侵略中国以来，中国已經由封建主义社会轉变成成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在这一社会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以及与他们相勾結的官僚資本主义是压迫和阻止中国社会向前发展的反动力量，是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王座大山，因而是中国革命的对象。工业无产阶级由于經濟地位最低下，受压迫剝削最深，不仅与大生产相联系，而且很集中，因而是革命最彻底最坚决、最富有組織性紀律性、目光远大的阶级，是中国革命的領導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資产阶级由于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資本主义压迫剝削，日益走向貧困破产，他們迫切要求革命，是无产阶级最可靠的同盟軍；但是他們是小私有者，本身具有一系列弱点，因此，他們必須在无产阶

級領導下才能解放自己。民族資產階級是具有兩面性的階級，在一定時期一定程度上可能參加革命，但在另一時期又可能投入反革命陣營，他們與無產階級處於對立的地位，我們始終和他們之間充滿着尖銳的奪取領導權的鬥爭。根據對中國歷史特點的具體分析，毛澤東同志得出結論：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主要矛盾是中華民族與帝國主義的矛盾，封建勢力與人民大眾的矛盾；在這種情況下，中國革命的任務是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對中國的統治，而不是消滅一般的資本主義；中國革命的性質只能是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而不是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同時毛澤東同志又從當時的具體歷史條件出發，指出中國革命是發生在俄國十月革命以後，和中國無產階級已經成為獨立的政治力量的具體歷史條件下，無產階級成為這一革命的領導階級，因此，它又不屬於舊的民主主義革命，而是屬於新的民主主義革命，革命勝利以後必然向社會主義方面發展。不僅如此，毛澤東同志根據馬克思列寧主義關於基礎與上層建築的原理，結合中國歷史特點指出：中國革命在新民主主義革命階段中只有首先用革命的手段推翻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反動政治統治，並與此同時建立新民主主義政治統治，才有可能以此作為保證去改變半殖民地、半封建經濟為新民主主義的經濟；並以此保證新民主主義經濟中社會主義因素的發展與鞏固。

由此可見，毛澤東同志的理論聯繫實際的方法論，一方面既認為馬克思列寧主義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我們在調查、分析、研究、處理事物時必須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普遍原理；另一方面又認為各國歷史特點不同，而且事物總是不斷發展的，馬克思列寧主義不可能具體地概括一切國家和一切時期的特點，因此必須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普遍真理與各國社會實際相結合，加以運用和發展，才能引導革命走向勝利。實踐是鑒定真

理的唯一標準，毛澤東同志的思想的真理性的，已經為我國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社會主義建設的勝利所完全證明。

毛澤東同志的思想之所以是最符合於中國革命實踐的學說，最根本的在於毛澤東同志的思想是建立在科學的革命的無產階級世界觀的基礎上的。不斷革命論和革命發展階段論相統一的思想，是毛澤東同志指導中國革命的一貫的思想。他從黨的最終目的是在中國建成共產主義出發，把各階段革命看成是總的革命的一部分。在分析到我國民主革命的性質、任務、前途時，都緊緊地和黨的最終目的聯繫在一起，指出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僅是整个革命過程中的必經階段，在民主主義革命過程中既要完成本階段革命任務，又要為準備社會主義革命創造條件。正由於在民主主義革命中始終堅持了無產階級領導權，從而創造了向社會主義順利過渡的必不可少的條件。毛澤東同志用階級分析的方法對共產主義和資本主義思想體系進行了分析，指出必須用共產主義思想進行宣傳教育，沒有共產主義思想作指導，民主主義革命不可能成功，就更談不上社會主義革命的最終勝利了。所有這一切都是“新民主主義論”中無產階級世界觀的最生動的體現。

(三)

“中國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這是關於中國革命的基本方向的問題。

毛澤東同志指出，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和十月革命以前是舊的資產階級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屬於舊的資產階級世界革命的範疇；在這以後，則是無產階級社會主義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屬於新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的範疇。它的特點是由無產階級及其先鋒隊中國共產黨領導的。

為什麼會有這個變化呢？這是由於第一

次世界大战之后出现了伟大的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结果。十月革命突破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出现了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改变了世界历史的方向。资本主义进入总危机阶段，开始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新时代。在这个时代，帝国主义快要死亡了，因而它就千方百计地进行垂死的挣扎，它就更加依赖剥削殖民地过活，拼命绞杀这些国家的革命。同时社会主义国家又是极力帮助这些国家的广大人民的革命的。在这种情况下，在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更加行不通了。中国资产阶级是特别软弱的，是害怕群众的，因此，在帝国主义侵略与镇压下，根本不可能把中国革命领导到胜利，这样，革命的领导权便必然落到中国无产阶级身上。正如毛泽东同志指出：“历史已经证明：中国资产阶级是不能尽此责任的，这个责任就不得不落在无产阶级的肩上了。”^①

为什么必须要由无产阶级领导呢？就因为中国无产阶级除了与最先进的经济形式相联系，富于组织性纪律性，没有私人占有的生产资料外，还受着三重压迫（帝国主义的压迫、资产阶级的压迫、封建势力的压迫），因而，在革命斗争中，比任何别的阶级都坚决和彻底；并且与广大的农民有着一种天然的联系；特别重要的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②，工人阶级迅速成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力量，建立了本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有可能提出彻底反帝反封建的纲领，指出了革命斗争的方向，并发动和领导广大农民，把革命斗争引向胜利。因此，这种革命就不是旧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而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了。

正由于这种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所以它的目的就不是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而是通过在第一阶段上建立的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几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国家，然后使之发展成为社会主义国

家。

但是，在当时，民族资产阶级还在幻想着建立资产阶级专政，国民党反动派也高唱资产阶级专政，用以掩盖其大地主大买办阶级专政之反动本质。毛泽东同志坚决地驳斥了这种反动滥调，而党内具有右倾机会主义观点的人则断定抗日战争之胜利，必然是国民党的胜利而不是人民的胜利，毛泽东同志也坚决地批判了这种错误思想。

毛泽东同志指出，要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社会，这完全是一种梦魇。因为自从十月革命以后，国际和国内的环境都不允许中国这样做。就国际环境来说，首先是国际帝国主义不允许。它们要把中国变成殖民地，决不允许中国独立和发展资本主义。其次，中国要独立，决不能离开社会主义的苏联和国际无产阶级的援助。就国内来说，大资产阶级只能和帝国主义及封建势力结成反革命联盟，残酷镇压人民，“资产阶级专政”的口号，只是他们用来掩盖其封建法西斯独裁的幌子。民族资产阶级极端软弱妥协，资产阶级专政只是他们一种反动的幻想。特别是中国人民有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它领导着中国人民胜利地进行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绝对不容许走资本主义道路。这样，毛泽东同志就完全粉碎了所谓“资产阶级专政”的谬论。

由此可见，资本主义道路，资产阶级专政在中国是完全行不通的。唯一的道路是建立人民民主专政，走社会主义的道路。

中国革命的胜利，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它宣布了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的彻底破产。从此，中国永远结束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悲惨命运，走上了社会主义的光明大道，这是一切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真正出路。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646页。

② “论人民民主专政”。

(四)

不断革命論和革命发展的阶段論，是馬克思列宁主义辯証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一个重要的基本原理。毛澤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論”中，結合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成功地运用这个原理，解决了中国革命由民主主义革命轉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极端重要而复杂的問題，从而創造性地发展和丰富了馬克思列宁主义的这一重要原理。

毛澤东同志指出：由于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由于十月革命以后，中国革命的領導責任已由中国共产党来担当了，这就决定了中国革命必須分为两个步驟。第一步，进行民主革命，改变这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第二步，使革命向前发展，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社会。

很清楚，毛澤东同志是把我国民主革命阶段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区别开来的。民主革命阶段的任务是反帝反封建，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任务是消灭私有制，建設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这是性质不同的两个革命过程，只有完成了民主革命，才談得上社会主义。如果要想超越客观实际的条件，把社会主义革命和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不分阶段地放在一起去完成，只能陷于空想，将革命导致于冒險主义的失敗結局。

毛澤东同志是坚决主張革命发展的阶段論的，所以，相应地制定了党的最低綱領和最高綱領，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行最低綱領，社会主义革命实行最高綱領，因而正确地指导了中国革命。

同时，毛澤东同志又是坚决主張不断革命論的。他认为我国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并不是完全割裂的，而是必須銜接的，民主革命应为社会主义革命准备条件，以便在民主革命完成后，立即轉入社会主义革命。中国革命的第一阶段，不是要建立資产階級

专政的資本主义社会，而是要建立无产階級領導的几个革命階級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然后革命向前发展一步，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这种革命的結果，固然一方面会有資本主义因素的若干发展，但另一方面更其重要的是社会主义因素必然有更大的发展，特别是无产階級对于革命和在国家生活中的領導地位，它是具有决定性作用的因素。这样，就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轉变創造了必要的前提。所以，毛澤东同志指出：“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①

这样，毛澤东同志就把不断革命論与革命发展阶段論辯証地結合了起来。右傾机会主义之所以錯誤，就在于他們把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旧民主主义革命混淆起来，把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割裂开来，否认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間的銜接，认为两者之間有着一道不可逾越的万里长城，要橫插一个資产階級专政的阶段，提出了所謂“二次革命論”。其結果放棄了无产階級对于民主主义革命的領導权，墮落为階級投降主义，使革命遭受了严重的損失。“左”傾机会主义之所以錯誤，就在于混淆了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质的差別，把反帝反封建和反对資本主义的任务同时并举，主張所謂“一次革命論”。他們主觀地要急于超过民主主义革命，他們否認了民主主义革命的长期性和艰巨性，认为轉瞬之間即能胜利。結果就放松了对当前任务的努力，扩大了敌人，孤立了自己，同样使革命遭到严重的損失。所有这些謬論，都被毛澤东同志粉碎了。

我們党正是根据毛澤东同志的这种不断革命論和革命发展阶段論的思想，在民主革命已經取得偉大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一經建立时，立即把民主革命轉变为社会主义革

① “毛澤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622頁。

命，并且及时地批判了所謂“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等右傾思想，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綫。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时期，毛澤东同志又創造性地运用这个原理去分析和处理了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轉变的問題。指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間，沒有隔着也不允許隔着万里长城，但也不应把两个不同质的阶段混淆起来。我們不能在社会主义阶段上停步不前，也不能陷入超越社会主义阶段而跳入共产主义阶段的空想。一方面进行經濟战綫和政治、思想战綫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另一方面大力进行社会主义建設，从而正确地解决了社会主义建設和人民公社发展中的一系列重大問題，促进了社会主义建設事业的高速度发展，积极为过渡到共产主义准备条件。

(五)

革命的根本問題是政权問題，而政权的性质是由革命的性质所决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既然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因此，在这个革命过程中所建立起来的政权，是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政权，形式上，和“苏联式”的无产阶级专政不同，但它必然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政权，实质上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而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則是这一政权性质的根本标志。

工人阶级领导权的問題，是关系到革命成败的中心問題，也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根本区别。中国人民革命的历史充分証明，沒有工人阶级的领导，要取得革命的胜利是根本不可能的。所以，工人阶级在这一政权中必須占领导地位。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由于它本身所处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經濟地位，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两重性”的特点，决定了它虽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時間內参加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但

却决不可能成为革命的領導阶级。因此，在革命政权中，它决不能占主要地位，更不能充当領導者。农民問題，在毛澤东同志看来，是解决工人阶级领导的中心問題，农民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其中約占农村人口70%的貧雇农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力軍。工人阶级必須领导农民，和农民結成巩固的联盟，才能在这个联盟的基础上，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取得民主革命的胜利。因此，在革命政权中，必須以工农联盟为基础。

毛澤东同志还指出，这种几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政权，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所采取的过渡的国家形式”^①，实质上，由于它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因而也是无产阶级专政。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轉变为社会主义革命，无产阶级专政的性质就更加明显了，它担負起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設的任务。由于工人阶级通过共产党在领导民主革命取得胜利的同时，巩固地树立了自己对国家的绝对领导权，从而保証民主革命順利地轉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并且不需要为了社会主义胜利再进行一次夺取政权的斗争。

同时，毛澤东同志还指出，这种几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政体是民主集中制。一方面是民主的，一方面又是集中的，“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②，这两方面是統一的，相輔相成的。沒有广泛的民主，就沒有高度的集中；沒有高度的集中，也不能更好地发揚民主。

民主集中制是毛澤东同志根据中国人民革命根据地长期政权建設經驗总结出来的最适合我国情况的政治制度，“它能够便利人民行使自己的权力，能够便利人民群众經常經過这样的政治組織参加国家的管理，从而得以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創造性”^③。

① “毛澤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647頁。

② “毛澤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1080頁。

③ 刘少奇：宪法草案报告。

中国人民就是运用这样的政治制度来保证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和沿着社会主义的道路前进。

(六)

毛泽东同志在这一著作中论述了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纲领。什么是党的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纲领呢？那就是要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官僚资本为国家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为什么实行的是这样一种经济纲领呢？这是因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所要消灭的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经济基础，而不是一般地消灭资本主义，同时，中国经济还十分落后，在革命过程中尚需要利用资本主义有益于国民经济发展的一面。实行这一纲领的结果，固然会使资本主义的发展获得某些便利条件，但同时却为社会主义的发展开辟了更为广阔的道路。

新民主主义经济是什么样的经济呢？它是一种过渡性经济，具有着多种经济成分，既有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又有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

新民主主义革命把官僚资本收归国家所有，组成了国营经济。这种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因为国营经济的性质取决于政权的性质；而当时的革命政权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国家。国营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领导力量，在国家政权的支持下将会获得迅速的发展，这就为社会主义革命准备了物质前提。

新民主主义革命没收地主土地为农民所有，改变了封建生产关系，解放了农村的生产力，农民的个体经济获得了发展。在个体经济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各种合作经济，也具有社会主义因素，它为后来社会主义的农业集体化准备了条件。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民族资本主义在一个时期里会有相当程度的发展，但是它的发展并不是漫无限制的，而是要服从国营经济的领导，不能操纵国家经济命脉。由于

有这个条件，从而就为以后对资本主义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有利条件。

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发展前途怎样呢？它既然是一种多种成分的经济，尤其是其中有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对立的经济成分，不可能不互相干扰，长期地共存下去。但是由于国家政权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社会主义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居于领导地位，这就决定了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发展前途不可能是资本主义，只能是社会主义，这是不可阻挡的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七)

文化革命是观念形态上反映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并为它们服务的。所以，在民主革命阶段，文化革命的任务，就是打倒为帝国主义和封建阶级服务的帝国主义文化和半封建文化，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也即新民主主义文化。

这种新民主主义文化，它的内容是反帝反封建的，是新民主主义政治和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反映。但它是由无产阶级领导的，并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指导的，因而具有社会主义的因素，这种因素在新民主主义文化中起着决定性作用。由于中国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因而新民主主义文化也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新文化的一部分，是它的伟大同盟军。

毛泽东同志坚决反对“不愿工农在文化上抬头”的资产阶级的文化专制主义，并且指出：资产阶级顽固派的这条文化专制主义的道路是走不通的。

这样，就为新民主主义的文化革命规定了明确的任务和方向。

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明确指出了这种新民主主义文化必须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的方针。对封建的西方的文化提出了剔除糟粕、吸收精华的原则，正确地解决了外国文化

和民族文化的关系及对待古代文化的态度。既反对了所谓“全盘西化”的错误主张，又反对了“兼收并蓄”的复古主义倾向。

这一切，都是毛泽东同志结合中国的实际，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文艺思想的伟大贡献，是创造性的、发展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新民主主义论”是关于中国革命的完整理论组成部分之一。它不仅像灯塔一样，为中国人民指引了前进的道路，使中国人民赢得了民主革命的伟大胜利，而且对于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仍然具有重大的意义。

中国革命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革命的典型。毛泽东同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科学地、有系统地、典型地解决

中国革命的理论，也就一般地解决了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中一系列重大的问题。因此，毛泽东同志的理论，不仅对中国革命具有重大的意义，而且对于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也都具有普遍的意义。

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特别是关于不断革命和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思想，这一切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这是对于整个马克思主义宝库的伟大贡献，因此，毛泽东同志的理论还具有伟大的国际意义。

我们纪念“新民主主义论”发表二十周年，就应该更好地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用毛泽东思想武装我们的头脑，为实现更大更好更全面的跃进而努力！

对我国工农联盟问题的学习体会

章 德

农民问题，是我国革命时期和建设时期的一个根本问题。无产阶级同农民结成巩固的阶级联盟，是取得革命胜利的重要保证，和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力量。

过去在民主革命时期，毛主席曾一再指出：农民是中国无产阶级的最广大和最可靠的同盟军，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中国的革命战争实质上是农民战争。我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来领导，而领导农民一起进行革命，乃是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根本标志。无产阶级也只有同农民结成了联盟，才能够在这个联盟的基础上同民族资产阶级建立由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我国的无产阶级，在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紧紧地依靠广大的革命农民的积极支持，同他们结成亲密的联盟，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革命力量，终于在1949年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新中国成立前夕，毛主席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指出：“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又说，工人和农民“这两个阶级占了中国人民的百分之八十到九十。推翻帝国主义与国民党反动派，主要是这两个阶级的力量。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主要依靠这两个阶级的联盟。”这里无比清楚地向我们指出：工农联盟是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础，是在整个过渡时期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社会力量。

我们的国家，即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以

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是要在我国消灭剥削、消灭阶级，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为此，工人阶级必须经过自己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以人民民主专政为武器，向国内的反动阶级、反动派和一切反抗社会主义革命、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反动分子及坏分子实行专政，并且防御国外敌人的颠覆活动和可能的侵略；另一方面要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把它们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的经济，并积极组织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文化革命。我们的专政，是以工人阶级为首的最大多数的人民对少数的反动阶级、反动派实行的专政；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是六亿人民的共同事业。工人阶级首先要同占我国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劳动农民结成联盟，充分发挥广大农民群众的力量，才能最有效地对敌人实行专政，才能最快地实现社会主义改造和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离开了五亿农民群众的力量，就不可能顺利地实现社会主义，和克服资本主义的一切反抗，也谈不上实现社会主义。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我国有五亿多农业人口，农民的情况如何，对于我国经济的发展 and 政权的巩固，关系极大。”（“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因此，不断地巩固和发展工农联盟，是我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重大问题。

李富春同志在“迎接一九六〇年的新跃进”一文中说：“我国的工农联盟，是在工人阶级领导下的、经过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

命而不断地巩固和发展起来的联盟。全国解放以后，我国的工农联盟已经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把工农联盟建立在彻底实行土地改革的基础上，第二个阶段就是经过农业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把工农联盟建立在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基础上。现在我国的工农联盟开始进入第三个阶段，要建立在新的基础上，这就是在继续发展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同时，逐步实现农业的技术改造，逐步实现农业的现代化。”（“红旗”杂志，1960年第一期，第4页。）

全国解放以前，我国的广大农民长期遭受封建地主的残酷剥削和压迫，他们迫切要求摆脱封建土地所有制的束缚，实现“耕者有其田”。党和无产阶级领导广大革命根据地的农民依据当时不同的历史情况进行了土地改革的斗争，同农民结成血肉般的工农联盟，取得了民主革命的伟大胜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最初几年，我们需要首先恢复几十年来被帝国主义掠夺和国民党暴政所破坏了的千疮百孔的国民经济，为大规模有计划地进行经济建设以及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准备条件。继续解决民主革命阶段遗留下来的任务，主要是在广大新解放的农村地区解决封建主义与民主主义即地主与农民的矛盾，这是恢复我国国民经济的根本条件之一。那时候，工人阶级为了和占全国人口最大多数的农民一起来巩固刚取得的人民民主政权和恢复国民经济，继续巩固和发展在长期民主革命斗争中同农民建立起来的阶级联盟，就必须在全国范围内彻底消灭地主阶级，把工农联盟建立在彻底实行土地改革的基础上。因此，党和工人阶级立即在新解放的农村地区展开了土地改革运动，有领导地放手发动群众，充分启发农民特别是贫雇农的阶级觉悟，由广大农民群众自觉地行动起来，消灭地主阶级，消灭封建土地所有制，而代之以农民土地所有制。土地改革以后，我国

的农民由土地的奴隶变成了土地的主人，多少年来被压抑和束缚着的生产积极性获得了解放，因而农业生产迅速恢复和发展起来，农民生活也得到了显著的改善。拿1952年同1949年相比较，农业总产值增长了48.5%，农民的收入一般增长了30%以上。农业生产的增长和农民购买力的提高，对我国整个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在土改中，农民在政治上彻底打垮了地主阶级的统治，他们的阶级觉悟大为提高，他们由地主的牛马变成了新农村的主人，他们在党的领导下，真正地掌握了政权，掌握了武装。人民民主政权在广大的新解放的农村地区巩固地确立了起来，因而加强了我国的人民民主专政。此外，富农在经济上大大地被削弱了，在政治上也彻底地陷于孤立；广大农民在同地主进行尖锐的阶级斗争中，认识到共产党领导的正确伟大，这些都给以后实现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前提条件。

不能设想，工农联盟是可能长久建立在不同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即农业是个体所有制、工业是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基础上的。党和工人阶级领导农民从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奴役下解放出来，并不是希望他们再遭受任何私有制度的束缚。1952年底在基本上完成了土地改革和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以后，党及时地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规定了在逐步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和逐步实现对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同时，逐步实现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我们要在农村中消灭富农经济，并改造个体农民经济，实行合作化，引导农民有步骤地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这样，工农联盟便开始进入到第二个阶段，即建立在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基础上。

从农民的长远利益来看，他们要永远免于贫困和经济生活不稳定的状态，获得彻底的解放，只有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才有可能。我国的劳动农民，过去几十年来是在

党和工人阶级的直接领导下参加了抗日战争和国内革命战争，在土地改革运动中，又是在党和工人阶级的直接领导下才从封建大山的重压之下翻了身，长期的共同斗争使他们同工人阶级结成亲密无间的血肉联系，无限信任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正确。又因为他们都是劳动者，他们是倾向和能够接受社会主义的。尤其是贫农和新中农中的下中农，他们是农村中的半无产阶级，是比较地不固执小农私有生产资料的制度，比较容易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他们是我国农村实现合作化的依靠。广大农民是愿意在党的领导下逐步地走上合作化的道路的。在土地改革的基础上，我国的农村开展了互助合作运动，到了1955年，全国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已经有六十三万个，入社农户占全国总农户的14.2%。但是另一方面，由于农民的个体经济是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上面的，所以他们特别是其中比较富裕的农民具有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事实上，虽然土改以后互助合作运动逐步开展了起来，但不少地区的农村中资本主义自发势力也有了一定程度的增长，农民两极分化的现象也已经出现。此外，建立在私有制上面的小农经济仍然限制着农村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不能够满足我国人民和社会主义工业化事业对粮食和原料作物的日益增长的需要，它的小商品生产的分散性是和国家有计划的经济建设相矛盾着的。因而这种小农经济和社会主义工业化之间的矛盾，已随着工业化的进展而日益显露出来。为了进一步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使农业合作化的速度和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速度相适应，经过合作化来促进工业化，在1955年的下半年，党中央和毛主席批判了当时某些人在指导农村合作化运动上的右倾保守思想，并且指出，如果在合作化道路上不“赶快上马”，工农联盟就有被破坏的危险。在党的指导下，一个全国范围内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高潮迅速形成了起来，基本上实现了

对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

在农业合作化高潮的推动下，手工业也出现了合作化的高潮。当城乡个体经济一旦都变为社会主义的集体经济以后，资本主义便失去了它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建立在社会主义所有制基础上的工农联盟，使国内阶级力量的对比发生了根本的改变，私营工商业者在大势所趋、人心所向的形势下，接受了全行业公私合营的办法，从而使我国基本上实现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样，我们在1956年基本上完成了在经济战线上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便稳固地建立在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所有制的经济基础之上了。

我国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按照具体历史条件和农民觉悟的程度而采取了三个互相衔接的步骤，即从互助组经过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到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每一次生产关系的变革，都不断地解放了农村的生产力，逐步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社会主义觉悟程度，使我国的农业生产在技术落后的条件下仍然逐年上升，农民的生活不断得到改善。经过1957年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批判了以富裕中农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倾向以后，广大农民进一步划清了两条道路的界限，社会主义觉悟大为提高。他们为了迅速发展农村经济，改变农村贫穷落后的面貌，于1957年冬季掀起了兴修农田水利建设的高潮，从而形成了农业生产以至社会主义建设大跃进的局面。他们感到原来的高级社的组织形式已经不能适应飞跃向前发展的生产力的要求了，于是在高级社的基础上创造了人民公社这种组织规模更大、活动范围更广、集体化程度更高的新的组织形式。由于人民公社完全符合我国经济和政治发展的规律，完全符合我国农民迅速发展生产的要求，因此在1958年，经过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倡导，只有几个月的时间，全国农村就实现了人民公社化。

人民公社一經出現，就显示出它的强大的生命力和无可比拟的优越性。它使我国的工农联盟建立在更强大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基础上。它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大跃进的产物，反过来又促进了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大跃进。在1958年即人民公社产生的头一年，我国的工农业总产值比1957年增长了48%；其中农业总产值增长25%。到了1959年，我们在1958年大跃进的基础上又实现了国民经济的继续大跃进，工农业总产值比1958年增长了31.1%，这一年虽然我们遇到了几十年来没有过的严重自然灾害，但是由于人民公社在抗灾斗争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我国的农业仍获得了全面大发展，农业总产值比大跃进的1958年又增长了16.7%。两年来，工农业相互支援的情况比以前有很大的发展，城乡关系也更为融洽了。随着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日益发展，1958年工业向农业提供的主要生产资料为三十一亿五千万万元，相当于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提供的生产资料总和五十一亿九千万万元的一半以上，1959年又比1958年增加了22%；农业也由于本身的大跃进而向工业提供了比第一个五年计划任何一年更多的粮食和原料作物。由于农业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农村支援了工业和其他经济部门大量的劳动力，两年来新增加的近两千万职工大部分来自农村。我国农民的平均收入1959年比1957年增长了20%左右；更重要的是，由于人民公社实行了工资制和供给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又举办了許多集体福利事业，广大农民得到了最重要和最可靠的社会保险。

人民公社的建立推进了社会主义革命在农村中的深入发展。农业合作化，使我们把农民个体所有制改变为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铲除了资本主义在农村中的基础。公社化以后，不仅根除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残余，同时由于公社的所有制包含着全民所有制的成分，这就使我们找到了一条由社会主义集

体所有制向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逐步过渡的道路，随着全民所有制成分的逐步扩大，农村中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成果就将进一步巩固与发展，滋长资本主义的残余根基就被彻底地清除了。

政社合一、工农商学兵相结合的人民公社，是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的统一体，它便于党实行集中统一的领导。这样，既便于在人民内部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加强团结，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又便于对敌人实行专政。

通过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我国的农业已成为社会主义的农业了，我国的农民已由经济生活不稳定的个体农民逐步变化为生活稳定并日趋富裕的社会主义合作化的农民以至现在公社化的农民了。我们依靠工农联盟，调动了五亿多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和主动性，发挥了他们充沛的革命干劲，使他们参加到建设社会主义大军的行列中来。可以说，我们国家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中每一项成就的取得，都是与工人阶级领导下的工农联盟这个伟大的力量分不开的。

全国农村人民公社化以后，党在八届六中全会所通过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从现在开始，摆在我国人民面前的任务是：经过人民公社这种社会组织形式，根据党所提出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高速度地发展社会生产力，促进国家工业化、公社工业化、农业机械化电气化，逐步地使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从而使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全面地实现全民所有制，逐步地把我国建成为一个具有高度发展的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是一个十分巨大的复杂的任务，我们必须紧紧依靠工农联盟并在继续加强工农联盟的前提下，继续保持同可以合作的非劳动人民的联盟，调动全国人民的一切力量，来尽快地实现这个任务。

工农联盟的基础必须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发展。目前，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已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即国民经济以比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更高的速度持续跃进的阶段。我国的工农联盟也随着社会主义建设新阶段的开始而开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要建立在新的基础上，就是在继续发展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同时，逐步实现农业的技术改造，逐步实现农业的现代化。

经过了合作化以及人民公社化，我国的农业已经转变为社会主义的集体经济了。但是，根据党在八届六中全会上的指示，为了适应生产力的更进一步发展，我们还需要继续发展农业的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使它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现在的人民公社所有制是以生产队所有制为基础的，而公社所有制则是部分的，可是这部分公社所有制已包含着某种程度的全民所有制成分。我们要运用公社公共积累的不断增长以及国家力量的帮助而使社有经济逐步发展，使公社所有制的部分逐步扩大，从而使目前以生产队所有制为基础的公社集体所有制过渡到以公社所有制为基础的公社集体所有制，这样，就为我国农村中的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向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过渡，奠定了可靠的基础。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工农联盟既不可能长久建立在不同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基础上，也不可能长久建立在两种相差悬殊的技术，即农业是落后的手工技术、工业是先进的现代技术的基础上。社会主义社会不但要求有现代化的工业，同时要求有现代化的农业。要把我国落后的农业经济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农业，除必须实行所有制的革命，即实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把个体私有制改造成为社会主义所有制（这点，我们已经做到了）以外，另一方面是要实行技术革命，使农业由使用落后的手工技术改为先进的现代技术进行生产，实

现农业机械化电气化。在农业合作化以前，由于当时我国的工业基础还很薄弱，一时还不能生产大量的农业生产资料来装备农业，因此，一方面我们集中力量来建立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以便为农业的技术改造准备物质条件，另一方面，我们积极推行农业合作化，然后在合作化的基础上，随着国家工业化的发展，逐步实现农业现代化。

在现阶段，为了巩固和发展工农联盟，在继续发展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同时，需要逐步实现农业的技术改造，逐步实现农业的现代化，也就是进一步对农业实行技术革命，解决农业技术落后与工业技术相对先进的矛盾。我国的农业在合作化和公社化过程中，随着国家工业化的发展，已经较前更多地使用农业机械进行操作，但是总的说来，在目前基本上还没有摆脱使用手工工具操作的状况，农业水平也还是很低的。可是随着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高速度发展，我们要求于农业的是提供比现在成倍、几倍增长的粮食和原料作物，要求农村提供几千万、成亿的劳动力转到工业和其他部门中去。在五亿人口主要使用手工工具从事农业生产劳动的状况下，是不可能满足上面的要求的。在我们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地大物博的国家里，农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农业迅速发展了，轻工业、重工业以至整个国民经济都将随之迅速发展。因此，我们在加速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同时，必须加速实现农业的技术改造，以现代技术来装备农业，迅速提高农业生产率，使农业的发展同工业的发展相适应。这是目前极为重要的一项任务。否则，就将拖缓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发展速度，对整个国民经济今后的持续跃进将是不利的。

现在我们已经有了物质技术条件来加速对农业进行技术改造了。经过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胜利完成和两年来的连续大跃进，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已经建立起来并且在不断地加强着。我们已经能够自己供应农业

以相当数量的拖拉机、联合收割机、排灌机械、载重汽车、化学肥料、各种农业机械等等生产资料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过程，必然是不断地用新的技术来装备农业、提高农业生产力的过程，也是使工农联盟能够在工农现代化生产的物质技术基础上更加巩固和发展的过程。另一方面，人民公社这种组织形式，也为农业大规模使用现代技术提供了更好的条件。由于人民公社“一大二公”和工农商学兵、农林牧副渔相结合的特点，它比起高级社来可以在更大的范围内统一规划安排生产建设事业，它可以发展多种经营而使公社的公共积累不断增长，这样就有更雄厚的经济力量来吸收更多的农业生产资料来装备自己。同时，地方工业特别是县、社办工业也普遍迅速发展起来。在我国目前条件下，为了从多方面来进行对农业的技术改造，也要采取“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即新式机器和改良农具同时并举、洋的和土的同时并举的方针。因此，地方工业在对农业技术改造方面，将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综上所述，把继续发展社会主义所有制同逐步实现农业的技术改造结合起来，是在社会主义建设现阶段继续巩固和发展工农联盟的新内容，同时也为逐步消灭城市和乡村、工人和农民之间的差别创造条件。

不论在民主革命时期，或是在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工农联盟必须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一种阶级联盟。不断加强工人阶级对农民的政治思想领导，始终是巩固工农联盟的关键。毛主席曾指示我们：“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论人民民主专政”）。根据个体农民是劳动者同时是私有者这个特点，党和人民政府在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一方面运用国家力量从经济政策上采取各种措施有步骤地割断农民个体

经济同资本主义经济的各种联系，帮助农民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另一方面经常不断地对农民进行细致耐心的社会主义教育，激励和发扬他们的社会主义觉悟。合作化的完成，仅仅是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消灭了资本主义，还必须在农村继续进行政治上、思想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兴无灭资”，使无产阶级思想在农村阵地中巩固地确立起自己的统治地位。1957年下半年，党领导人民在城市进行反对资产阶级右派的斗争的同时，在农村也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进行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大辩论，有力地批判了以富裕中农为代表的资本主义思想，使广大农民的社会主义觉悟大为高涨。党中央提出的经过全民讨论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也给我国农民一次深刻的前途教育，动员他们积极为建设美好的社会主义新农村而努力。人民公社的产生，就是标志着农民社会主义觉悟大高涨的结果，反过来，人民公社成立后所日益显示出来的优越性，对农民又是经常的深刻的现实教育。今后，教育农民仍然是一个严重的问题。由于他们过去长期处于小私有者的地位而摆脱并不很久，在经济上虽然已同私有制度割断任何联系，只是小私有者的思想意识和习惯势力并不是很快就能消除的，有些农民还不十分习惯于集体主义的生产和生活。同时，复杂的阶级斗争还存在，在农村中还有政治上、思想上两条道路的斗争，资本主义势力还会极力设法影响他们。因此，党和工人阶级仍然需要根据农民自己的生活经验对他们进行长期的细致的政治工作和思想工作，使广大农民不断提高社会主义觉悟，牢固地树立起集体主义思想，经常地鼓足干劲，力争上游，成为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自觉的劳动者！

發揮审判工作职能 为两条道路斗争服务

戴 福 康

当前，城乡中深入开展的两条道路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一场捍卫总路线、捍卫社会主义的斗争。作为党的专政工具——人民法院就应在党的领导下，发挥审判工作的职能，为两条道路的斗争服务，保卫总路线、保卫大跃进、保卫人民公社。

江苏省各地人民法院在党的领导下，依靠群众，通过审判活动为两条道路斗争服务，是有很大成绩的。特别是在贯彻执行反右倾、鼓干劲指示之后，司法干部的思想进一步明确了审判活动必须坚决保卫总路线、保卫大跃进、保卫人民公社，从而更加自觉地积极地为当前两条道路斗争服务。从这一时期各地审判活动的实践来看，比较成功的做法和经验是：密切注意掌握了解和分析研究各个方面各个时期阶级斗争的具体情况，将案件分类排队，根据当时当地党的中心工作、阶级斗争的需要，有步骤、有目的、有准备、有组织地携卷下乡、下街道及其他案件发生的处所，在当地党委的领导下进一步收集了解情况，进行就地公开处理，便利群众自由参加旁听，并组织有关部门人员和有关群众参加旁听，以揭露和惩罚犯罪，作为反面教材，结合当时当地具体情况和存在的问题，进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和道德品质的教育、革命警惕性的教育，也就是两条道路斗争的教育，破资产阶级思想、立无产阶级思想，防微杜渐，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使社会主义思想阵地不断巩固和扩大，推动党的中心工作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如镇江市人民法院在增产节约运动中，在党委

领导下，与公安、检察部门配合，会同市场管理部门，在全市查出少数人破坏市场管理和其他违法的行为。其中有的是情节严重的非法奸商和地、富、反、坏分子，有的是属于有一般违法行为的商贩，审判人员按照政策，严格区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在党委领导下，对应受法律制裁的犯罪分子进行就地公开审判，组织有关商贩参加旁听。通过对一些情节严重的犯罪分子的惩办，犯罪事实的揭露，使群众认识到投机倒把对社会主义建设、对人民生活的严重危害，是反社会主义的破坏行为，是深刻的阶级斗争在市场问题上的反映，提高了群众的觉悟和同投机违法活动作斗争的积极性。这样，通过审判活动不仅惩罚了犯罪分子，也教育了广大群众，特别是有类似错误思想行为的人，更是受到了深刻的教育，不再向错误的道路继续发展下去。当然，这些成绩是党的领导的结果，是政法部门共同努力执行党的方针、政策路线的胜利。这说明了根据党的中心工作、阶级斗争的需要进行审判活动，以社会主义教育为纲，开展两条道路斗争的教育，这种就地办案的方式方法是更为适合当前政治斗争形势的要求，就能更好地为两条道路斗争服务。

但是，这种做法还并未为所有的同志理解和习惯，有的还不善于抓住反面教材，开展两条道路斗争的教育；有时，他们虽也这样做了，但不是自觉的，这就是因为在思想上对这样做的目的性和必要性还缺乏明确的认识，因此，政治效果就不显著。

为什么說上述那种办案的方式方法是更

为适合当前政治斗争形势的要求呢？这是因为审判活动的方式方法是决定于各个时期政治斗争任务的需要，它随着斗争形势的发展而发展。在革命战争时期和全国解放初期，党领导群众斗争的主要任务是从反动统治下解放人民，从旧的生产关系的束缚下解放社会生产力。当时的主要矛盾是人民群众和三大敌人之间的矛盾。人民法院通过对反革命分子、土匪、恶霸、不法地主坚决的打击，支持群众斗争，进一步发动群众去和反动统治集团遗留下来的残余势力作斗争。今天斗争的形势不同了。在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基本上完成，新的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经过1957年的整风、反右派斗争，政治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也已取得了重大胜利；国内残余的反革命已经基本肃清，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但还有阶级斗争，还有反革命，还有反革命破坏。过渡时期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期的、曲折的、复杂的。正如刘少奇同志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的工作报告中所指出的：“在整个过渡时期，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社会建成以前，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始终是我国内部的主要矛盾。这个矛盾，在某些范围内表现为激烈的、你死我活的敌我矛盾……。但是在我国目前的具体条件下，上述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矛盾在大多数的情况下表现为人民内部矛盾。”我们不仅要在经济战线上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还必须要在政治战线上、思想战线上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破除资产阶级世界观、肃清资产阶级的思想影响，要比政治上推翻反动政权，经济上消灭剥削制度复杂得多，时间要长得多。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个著作中明确地指出了这个问题。他说：“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资产

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习惯势力，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还会存在，并同社会主义制度相抵触。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的不断胜利和深入，这方面的斗争也将是逐步深刻。目前的情况是，当着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贯彻执行和实现了人民公社化，要最后结束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私有制的时候，不但残余反革命分子蠢蠢欲动，乘机进行破坏，而且在一部分人中间，主要是一部分资产阶级分子，一部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一部分富裕中农，他们的思想还有抵触，甚至进行抵抗、攻击，这也是符合阶级斗争的发展规律的。在过渡时期，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之间的斗争，是国内的主要矛盾。这种矛盾，在我国具体历史条件下，大多数表现为人民内部矛盾，在某些范围内表现为敌我矛盾；只要当斗争的性质还属人民内部矛盾的时候，在处理上就应当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坚持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来解决矛盾。当然，我们应清醒地看到在人民内部矛盾中，少数对党对社会主义严重不满的分子，个别的也会从人民内部矛盾转化为敌我矛盾；有时在人民内部矛盾的背后也隐藏着敌人的阴谋、挑拨和唆使；有时两类矛盾互相交织在一起，斗争是复杂的。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一部分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分子及其知识分子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抵触、不满正是敌人得以利用进行破坏活动的空子。当前在城、乡中深入开展两条道路的斗争，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正是为了划清大是大非，提高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和共产主义的道德品质，坚定地走社会主义道路；同时，也更有利于彻底孤立和暴露那些坚决的敌人，有利于解决敌我矛盾。这是关系到保卫和贯彻总路线，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的问题。既然目前总的斗争形势和任务是这样的：有尖锐的你死我活的敌我矛盾，需要我们继续加强专政工作，及时予以惩办；也有大量的人民内部

矛盾需要解决，因此，作为人民民主专政的武器之一的人民法院就必须发挥它特有的职能——审判的职能，为当前在城乡中深入开展的两条道路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服务。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刑事犯罪分子，他们反对社会主义制度，他们道德败坏，他们破坏社会秩序；民事案件也往往反映了两条道路、两种思想的斗争。通过刑、民案件处理，从反面教材着手，进行正面教育，配合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就更能使群众认清反革命分子和城乡不法资产阶级分子反社会主义的丑恶面貌和本质，以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危害，从而得到深刻的教育。特别是根据案件的类型、性质，有意识、有目的地组织有关这方面群众参加旁听，提高觉悟，提高警惕，更能起到免疫作用，同时促使坏的向好的方面转化，消除犯罪和纠纷于萌芽状态，使资本主义自发势力、资产阶级腐朽堕落的思想得到有力抵制，社会主义思想阵地不断扩大和巩固。

审判活动必须为两条道路斗争服务，实践中也已创造和积累了一些经验，但如何运用这些经验更好地为两条道路斗争服务，从这一时期各地的实践中体会到必须解决以下几个问题：

首先，要政治挂帅。所谓政治挂帅就是党的领导挂帅，总路线挂帅，党的司法工作路线挂帅。

党的领导挂帅就是要十分自觉地服从党的领导。审判工作是镇压敌人，保卫社会主义、保护人民的工具，它必须是各级党委最得心应手的工具。审判工作只有在各级党组织的具体领导之下，为党的中心工作服务，才能充分发挥为政治斗争服务的作用。工作中不尊重和不心悦诚服地服从当地党组织的领导是十分错误的。以上所举镇江市的审判活动在为两条道路斗争服务中所取得的成就，就是坚决自觉地服从了当地党委的领导。当前社会主义革命进一步深入，在两条

道路的斗争十分曲折、复杂的情况下，只有紧紧地依靠党的领导，才能明辨风向，识别是非，正确地区分两类矛盾，正确地贯彻执行党的正确的方针、政策、路线。离开了党的领导，必然要导致政治上迷失方向，犯原则性的错误。

要正确地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路线，还必须与存在于我们一部分审判人员思想中的一切与总路线精神相违背的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作坚决的斗争，以确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世界观和人生观。这次整风运动正是要解决这个问题。为了提高我们的马列主义水平，提高我们对贯彻和保卫总路线的自觉性，必须通过这次整风运动，牢固地确立无产阶级世界观，切实做到政治挂帅。

政治挂帅，在司法部门来说，也就是党的司法工作正确路线挂帅。司法战线上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虽经过1957年的整风反右派斗争，取得了重大的胜利，但这个斗争并未止息。资产阶级的法律观点还未彻底肃清，它还在一旁伺机再起，它在一部分有右倾思想和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人们中还有市场。这是因为有了右倾思想和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就会丧失掉对资产阶级法律观点的免疫力。彻底地揭发批判一切违背党的司法工作路线的思想行为，坚决地自觉地贯彻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司法工作才能大跃进，才能多快好省，才能更好地为两条道路斗争服务，才能更好地保卫总路线。这是已被1958年1959年两年来司法工作持续大跃进的事实所证明了的。

第二，要大走群众路线、大搞群众运动。要有“群众的事群众办”“以群教群”“全民办司法”的观点。

审判工作要大走群众路线，走群众路线要有彻底性，不仅调查案情深入群众，依靠群众，研究处理方法、意见也要走群众路线；就地处理时也要发动群众，组织和让群

众发表意見；处理后也要听取群众反映。大走群众路綫的結果势必不是少数人在那里办案，不是少数人在那里和違法犯罪分子作斗争，而是发动和吸收了广大群众参加一起来办案，一起来同那些破坏社会主义建設的違法犯罪分子作斗争。我认为这就是审判工作大搞群众运动的一种方式。其結果，不仅是是非分明，声势壯闊，打击有力，而且办案的过程成了教育和提高广大群众的过程。群众通过参加审判活动受到深刻的教育，划清了大是大非，就更能激发、鼓舞群众为总路綫奋斗的積極性，人民内部的矛盾就能大大的縮小和减少，歪風邪气就能大大地受到抵制，社会主义思想陣地就能不断扩大、巩固。

第三，要为中心工作服务。党的总路綫的实质就是高速度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設。我們是要通过审判活动促使刑、民事发案率不断下降，使社会秩序更加良好，工农业生产不断上升。工农业生产不断增长，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不断胜利，刑、民事发案就会更少；而刑、民事发案减少，社会秩序更加安定了，又反过来促进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和社会主义建設的加速进行。这是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关系。因此，我們必須要关心工农业生产，关心建設的安危，关心群众的疾苦。离开了中心工作，就沒有政治，就談不上为社会主义建設服务。

为中心工作服务的态度問題，是有沒有全党全国一盘棋的思想，有沒有全局观点的問題。实质上也就是对服从党的领导的態度問題。在社会主义建設过程中，在两条道路斗争中，有各种方面的矛盾。但也正如毛主席在“矛盾論”这一著作中所指出的：“然而不管怎样，过程发展的各个阶段中，只有一种主要的矛盾起着领导的作用”，“其他則处于次要和服从的地位”“不能把过程中所有的

矛盾平均看待，必須把它們区别为主要的和次要的两类，着重于捉住主要的矛盾。”^①各个时期党的中心工作就是各个时期党领导下的政治斗争中的主要矛盾。主要矛盾不解决好，就要影响到大局。正因为这样，党的中心工作就成了敌人破坏的中心，也成了我們保卫的中心。

我們必須在思想上牢固地确立为中心工作服务的观点，同时，在具体工作中还应做到以下几点：

1. 积极认真地学习有关党的中心工作的方針、政策；

2. 钻到中心工作中去，了解中心工作的开展情况和有那些影响中心工作开展的因素，提出措施、意見，向党委請示汇报，并在党委领导下积极地排除这些障碍；

3. 把审判活动主动納入到党委的工作部署中去，成为党的工作的一个組成部分。这样，不仅教育面广量大，而且深透全面；

4. 在日常工作中应贯彻先中心工作后一般的原則。

只有牢固地树立全局观点，顾大局、識大体，在党委統率之下，积极發揮部門工作的積極性、主动性，才能更好地为中心工作服务。

第四，要大搞协作。两条道路的斗争是复杂的，它反映在各个方面、各条战綫上。因此，审判工作除在党委統一领导下与公安、檢察部門密切协作外，还应經常地和其他有關部門联系，了解各个方面、各个时期的阶级斗争情况，了解各个部門的工作中心和他們对审判活动的要求。这样，就能更好地实事求是地計劃和安排审判活动，提高自觉性和减少、克服盲目性，就能更好地發揮审判工作的职能，获得最大的政治效果。

① “矛盾論”，“毛澤东选集”第2卷，第788頁。

駁“階級鬥爭熄滅”論和 “專政消亡”論的觀點

王 云 生

無產階級專政是馬克思列寧主義階級鬥爭學說的核心，是無產階級革命的根本問題。它的作用是：（1）壓迫國家內部的反動階級、反動派和反抗社會主義革命的剝削者，壓迫那些對於社會主義建設的破壞者，就是為了解決國內敵我之間的矛盾。為了維護社會秩序和廣大人民的利益，對於那些盜竊犯、詐騙犯、殺人放火犯、流氓集團和各種嚴重破壞社會秩序的壞分子，也必須實行專政。

（2）防禦國家外部敵人的顛覆活動和可能的侵略。在這種情況出現的時候，專政就擔負着對外解決敵我之間的矛盾的任务。專政的目的是為了鞏固無產階級革命勝利成果，保衛全體人民進行和平勞動，將我國建設成爲一個具有現代工業、現代農業和現代科學文化的社會主義國家。

我國人民在以毛澤東同志爲首的黨中央的英明領導下，1949年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勝利地實現了民主革命向社會主義革命的轉變。建國以後，為了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領導和發動全國人民徹底完成了土地改革，取得了鎮壓反革命運動和抗美援朝的巨大勝利，恢復了國民經濟，進入了有計劃地大規模的經濟建設，完成了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經過1957年的整風運動和反右派鬥爭，取得了政治、思想戰綫上社會主義革命的決定性的勝利。1958年黨的八大二次會議根據毛澤東同志的創議提出了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總路綫，全國人民在這條總路綫的光輝照耀下，開創了一個國民經濟全面大躍進的局面，在全國範圍內實現了人民公社化，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正在以更高的速度向前發展。我

國人民所取得的這些偉大成就，正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在我國的勝利，毛澤東思想的勝利。

但是，就在我們國家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事業由勝利走向勝利的時候，却有人說什麼：人民公社化了，生產資料所有制解決了，剝削階級不存在了，階級鬥爭結束了，敵我矛盾沒有了，現在的任务只是建設，是向自然作鬥爭，剩下的只是人民內部矛盾了，專政已經是不需要的了。他們散布“階級鬥爭熄滅”論和“專政消亡”論的觀點，實際上，是取消無產階級專政，取消黨的領導。十分清楚，這種觀點是反馬克思列寧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是爲資本主義在中國的復辟開辟道路。

階級是不是消滅了呢？階級鬥爭是不是不存在了呢？誠然，作爲中國人民死敵的封建地主階級、官僚買辦資產階級以及代表這些階級的國民黨反動派早已被我們推翻了；帝國主義勢力已被驅逐；殘余的反革命勢力經過歷次的打擊，已基本上被肅清；地主、富農、一般反革命分子和舊社會遺留下來的社會渣滓正在被改造着。少數堅決與人民爲敵的反革命分子更少、更弱、更加孤立了；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私人所有制經過社會主義改造，實際上已經爲社會主義的全民所有制所代替；農村已經實現了人民公社化，實現了生產資料的集體所有制；但是階級鬥爭和敵我鬥爭並沒有因此而結束。如在社會主義三大改造基本完成以後，1956年帝國主義在世界範圍內攪起了一股反蘇反共逆流，匈牙利發生了反革命暴亂事件，國內的資產階級右派認爲時機已到，乘我黨1957年整風的機會，向党發起了猖狂的進攻。農村中一部分地、富、反、壞分子也乘機抬頭，與右派分

子相呼应，进行造谣破坏，海外美蒋特务机关也派遣特务间谍，加紧进行破坏活动。经过反击右派和给予了敌人严厉打击之后，敌我斗争形势表现缓和了。但是阶级斗争并没有停止。1958年秋美帝国主义在台湾海峡地区进行军事挑衅，制造紧张局势；一切帝国主义都对我们的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进行恶毒的污蔑。国内也有些极少数人和他们呼应。虽然这些叫嚣是徒劳的，但由此可见，只要世界上还有帝国主义存在，国内阶级还存在，阶级斗争就不会结束。只看到我们在经济、政治、思想战线上已经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決定性的胜利，和反革命残余势力已被基本肃清了的事实，就认为阶级斗争和敌我斗争已经不存在了，专政没有必要了，而散布“阶级斗争熄灭”論和“专政消亡”論的論調，显然是不符合客观情况的。

当然，由于我国的历史条件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特点，毛澤东同志创造性的运用和发展了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根据我国具体情况，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了和平改造的政策，把民族资产阶级同工人阶级之间的矛盾当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但是否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就没有阶级斗争了呢？就不发生对抗性的矛盾了呢？是否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阶级斗争的普遍真理在我国不适用了呢？毛澤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問題”的著作中已有明确指示：“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存在着剥削和被剥削的矛盾，这本来是对抗性的矛盾。但是在我国的具体条件下，这两个阶级的对抗性的矛盾如果处理得当，可以转变为非对抗性的矛盾，可以用和平的方法解决这个矛盾。如果我们处理不当，不是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团结、批评、教育的政策，或者民族资产阶级不接受我们的这个政策，那末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就会变成敌我之间的矛盾”。1957年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列宁在“无产阶级

专政与叛徒考茨基”一书中說：“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一个整个历史时代，只要这个时代没有结束，剥削者就必然存在着复辟希望，并把这种希望变为复辟行动”。虽然我国的民族资产阶级的大部分愿意接受改造，并且已经完成了生产资料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但资本家现在还拿定息，还有剥削，有一部分还顽固地坚持着资产阶级的政治立场和思想观点，在政治、思想方面还正在进行着斗争。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消灭，是消灭阶级的一个重大步骤，但这并不是最后的一步。因为维护阶级区别与消灭阶级区别的斗争，不仅表现在经济上，而且表现在政治上、思想上，尤其是政治上。因此就是将来资本家取消了定息，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完全消灭以后，而资产阶级的世界观，资产阶级的政治影响，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习惯势力还会存在一个很长时间，同社会主义相抵触。因而在整个过渡时期里，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政治和思想战线上的斗争还是存在的，毛澤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問題”著作中指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刘少奇同志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的工作报告中也指出：“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不但要彻底消灭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一切旧制度，而且要彻底消灭遗留在人们头脑中的，由这种旧制度所产生，为这种旧制度服务的一切旧思想、旧习惯，要消灭资产阶级思想，兴无产阶级思想，也就是說，要在人们的心理上最后地消灭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的一切残余”。由此就可以清楚地說明“阶级斗争熄灭”論和“专政消亡”論的观点，是没有任何根据的，完全是違背馬列主义和毛澤东思想的。

持“阶级斗争熄灭”論和“专政消亡”論观

点的人，以我国实现了人民公社化作为借口，就說专政可以消亡了，这是对我国当前社会制度和社会性质的一种曲解。人民公社制度，是我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的一个偉大創举，是我国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最好形式，它指出了“国家对內职能逐步縮小以至消失的道路”。但是，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一个相当长相当复杂的发展过程，而在这整个过程中，社会的性质基本上仍然是社会主义的。当前的任务是要在党的领导下，更好地发挥无产阶级专政的作用，加速社会主义建設，尽快地把我国建設成为一个具有高度发展的現代工业、現代农业和現代科学文化的偉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最終在我国实现共产主义社会。到那时，专政的职能主要是对付国家外部敌人的顛复活动和可能的侵略，而对內的专政职能已經不起作用了，但这还是将来的事情，还需要經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和艰苦的努力过程。我們說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加速社会主义建設，爭取早日实现共产主义，也正是为着消灭阶级和国家权力創造条件。但是在过渡到共产主义的过程中仍然存在着阶级斗争。党的八届六中全会“关于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中指出：“复杂的阶级斗争，不但在国外，在资本主义世界，严重地存在着；就是在国内，也还是存在着。要教育群众提高警惕，严防敌人的破坏活动”。显然持有“阶级斗争熄灭”論观点的人，在我們需要更进一步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加速社会主义建設的时候，居然散布“专政消亡”論的濫調，岂不是要我們在社会主义建設中不要进行阶级斗争，不要提高革命警惕，松懈斗志，让敌人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

我們說阶级斗争和敌我斗争还存在，还是长期的，还会有反复，并不是說社会主义革命越深入，建設越胜利，阶级斗争和敌我斗争就越尖銳。应当認識，阶级斗争总的說来是趋向緩和，敌人更少更弱更加孤立，現在我們同反革命分子的斗争，形势已經发生

了根本变化，同资产阶级在經濟、政治、思想战线上的斗争也已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目前残余反革命分子已經处于日暮途穷的絕境，敌人不仅更加孤立，而且活动也更加困难。资产阶级政治的、思想的影响已愈来愈小，形势对我们更加有利。但是我們也还必须看到，目前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在政治、思想战线上的斗争还在进行，国内残余反革命分子还未彻底肃清，潜伏的少数反革命分子，将隐蔽更深，活动更加狡猾，社会上的地富反坏分子还正在被改造，在沒有完全被改造好以前，还会进行犯罪活动，尤其不要忘记世界上还有帝国主义，台湾还没有解放，美蔣特务机关还不断派遣特务間諜，妄图对我国进行破坏活动和顛复活动，斗争还是长期的，有时甚至还有激烈的斗争。因此，我們决不能削弱我們国家的专政职能。我們必須正确地贯彻执行毛澤东同志的指示，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敌我矛盾必須采取专政的手段，按照“惩办与寬大相結合”的政策，严厉地打击那些敢于进行破坏活动的敌人。对于人民内部矛盾必須采取民主的方法，即“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經過批評或者斗争，使矛盾得到解决，从而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的方法。同时要善于掌握对敌斗争規律，注意矛盾的轉化，以正确地贯彻执行党的政策。

綜上所述，“阶级斗争熄灭”論和“专政消亡”論的观点，違背我国阶级斗争的客观现实，違背毛澤东同志的指导思想和馬列主义关于阶级斗争的基本原理，因此，它在理論上是荒謬的，在政治上是不反动的。散布这种观点，只会帮助一切反社会主义势力向无产阶级进攻，而不利于提高人民的革命警惕，同敌人进行斗争。因之必須彻底地揭发批判，树立明确的坚定的无产阶级专政思想，把革命进行到底，保卫社会主义建設事业的更大跃进。

（作者系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

批判資產階級刑事訴訟的“辯論原則”

沈 齊 思

資產階級“辯論原則”，是資產階級國家用所謂刑事“被告人”、“原告人”（檢察官、警官）的地位和權利平等，雙方有權在審判甚至在偵查中進行“辯論”以及法院在審判中保持“客觀”、“公正”，來標榜資產階級民主，掩蓋資產階級法院階級本質的虛偽原則。“辯論原則”和資產階級“法官自由心證”、“無罪推定”等一樣，都是屬於資產階級法的範疇，都是資產階級刑事訴訟的原則，它與我國社會主義的法是根本對立的。但是在整風反右以前，曾有人主張把“辯論原則”作為我國審判工作的基本原則。而在目前政法界，少數有嚴重右傾機會主義思想的人，也還很欣賞資產階級司法中的所謂“民主”原則那一套。他們以資產階級的法律觀點來看待我們的政法工作，抹煞政法戰線上大躍進的成績，懷疑、攻擊政法工作中黨的領導、群眾路線，並企圖篡改政法工作的無產階級專政的性質。事實證明，雖然經過了政法界的整風和反右派鬥爭，但是政法戰線上嚴重的鬥爭並沒有結束，我們必須把政法戰線上兩條道路兩種思想的鬥爭進行到底。為了徹底清除資產階級法律觀點的影響，劃清新舊法律的界線，本文擬對資產階級“辯論原則”的階級本質及其與我國審判工作的根本對立，加以批判分析。

一、從資產階級“辯論原則”的產生看它的階級本質。

資產階級“辯論原則”產生於西歐資產階級革命時期，是資產階級為了進行反對封建專制的鬥爭，針對封建的糾問式訴訟而提出的資產階級訴訟的所謂民主原則。英國資產階級革命時期小資產階級政黨——平均主義派領袖里爾邦，1649年在“人民約法”以及“英國根本法與自由”一書中，就曾提出審

判程序應該是辯論和公開的。十七——十八世紀歐洲資產階級革命時期的資產階級思想家——自然法學派，也主張在司法方面實行公開的辯論的訴訟程序。

資產階級革命勝利以後，“辯論原則”先後在資產階級立法或理論上確認下來。在英國形式上規定訴訟中被告人和原告人權利地位“平等”，偵查中有條件地允許“辯論”，審判中實行當事人“辯論”和“交叉訊問”的程序，而法院則處在所謂“不偏不倚”的“仲裁人”地位，“客觀”、“公正”地審判等等。1808年法國資產階級的刑事訴訟法典採用了“偵查辯論式”（或混合式）訴訟。偵查秘密進行，並禁止辯護，而在法庭審判中則還保留了虛偽的辯論程序。以後，歐洲大陸幾乎所有的資產階級國家，都先後規定了與法國大致相同的“辯論原則”。而美國則幾乎完全仿照英國實行“辯論式”的訴訟。

資產階級在反封建革命時期提出並在以後司法上確立下來的“辯論原則”，和資產階級當時所提出的其他“民主”、“自由”、“平等”等口號一樣，曾經具有一定的歷史進步意義。可是這種歷史進步意義，僅僅是指在當時反對殘暴的封建專制制度和司法制度，有利於推翻封建的生產關係，促進資本主義經濟發展，從而為生產力的發展掃除障礙這一點上；但絕不能過高地估計它的進步意義。正像列寧在論述資產階級民主的實質時所說：“資產階級民主同中世紀制度比較起來，在歷史上是一個大進步，但它始終是而且在資本主義制度下不能不是狹隘的、殘缺不全的、虛偽的、騙人的民主，對富人是天堂，對窮人和被剝削者是陷阱和騙局。”^①我們必須明確，資產階級“辯論原則”和其他資產階級的

所謂民主原則一樣，從它產生的那一天起，就是階級壓迫和統治的一種形式，就是資產階級建立和維護自己政治統治和欺騙的手段，在階級鬥爭中竭力以“當事人權利平等”，法官是“超階級”的“仲裁人”來掩蓋資產階級法院血腥鎮壓工人階級，維護資本主義統治，保護資本主義私有制和對勞動人民的殘酷剝削的階級本質。

資本主義國家的共產黨人、工人階級和其他勞動人民，在爭取和平、民主和社會主義的鬥爭中，為了維護自身的利益，為了反對資產階級法西斯的專橫暴虐，為了揭露其黑暗恐怖的統治，為了把廣大人民團結在自己的周圍，最後從根本上推翻資本主義剝削制度，除了用革命手段奪取政權以外，也可利用資產階級“辯論原則”作為武器同統治階級進行政治鬥爭，在受到反动統治階級司法迫害的時候，利用資產階級法庭作為揭露敵人、教育群眾的讲坛，這有時也是必要的。同時當革命者利用“辯論原則”來進行合法鬥爭時，資產階級反动統治者又想盡一切辦法肆意地加以阻撓和破壞，例如，宣布緊急狀態，秘密處死或軍法審判等等，這樣也就揭露了資產階級民主制的欺騙性和反動的階級本質，使人民從反面得到教育。可見，在資本主義國家，共產黨人和進步人士利用資產階級“辯論原則”，只是在一定條件下和反动統治階級進行政治鬥爭的一種手段。我們既不能過高估計這種合法鬥爭手段的作用，更不能因此而模糊了對資產階級“辯論原則”階級本質的認識。而在工人階級奪取了政權、實行人民民主專政的我國，則必須徹底拋棄資產階級的“辯論原則”，這是因為它與我國審判工作的性質、任務和指導思想根本不相容的。

二、資產階級“辯論原則”的所謂“客觀公正”、“不偏不倚”同我國人民法院作為無產階級專政的武器是根本對立的。

某些資產階級御用學者，虛偽地把刑事

審判說成是當事人之間的爭議，法官只是介乎當事人之間的仲裁人，他在訴訟中是“被動消極”的，“不偏不倚”的。例如，英國法官偽稱不訊問被告人証人，借以偽裝“客觀公正”。然而，事實證明，所有這一切都是騙人的幌子。我們知道，資產階級法院是資產階級國家機器的重要組成部分，是資產階級專政的工具。資產階級的法院審判就是資產階級鎮壓革命和勞動人民的反革命活動。事實表明，在審判中資產階級法官始終是頑固地站在資產階級一邊，積極地鎮壓革命和勞動人民，維護資產階級的利益。他們既不會幫助勞動者，也不可能採取袖手旁觀的中間立場。因為資產階級之所以需要法官，其目的就是通過法官的審判活動來懲罰一切侵犯資產階級利益的人，保護資本主義剝削制度。

實際上，資本主義法院的法官是統治階級豢養的忠實奴才。資產階級國家總是通過各種方式挑選和培養那些效忠於自己而又富有統治權術的人擔任法官、陪審官，成為壓迫勞動者，保護資本主義制度的有力武器。由於法官絕大多數出身於資產階級，而且長期受資產階級教育的熏染，這就決定了他們觀察、處理問題的資產階級立場和資產階級世界觀。他們把使勞動者陷於貧困、失業、死亡的資本主義制度奉為“永恒的正義”，而把工人階級反對資本主義的革命鬥爭看做最嚴重的“罪行”。因此，他們在實際審判活動中，極端仇視無產階級、勞動者而袒護資產階級，總是相信廠主而不相信工人。他們把窮人看作天生的盜賊，對於無產者的當事人，總是声色俱厲，吹毛求疵，使有理變成無理，盡量加重懲罰。例如在美國巴拿馬城，黑人羅茲·里德被控偷了兩角錢，竟被判了二十五年徒刑。而當資產階級法官在某種情況下迫不得已或由於資產階級內部矛盾而審判富人時，總是流露出和顏悅色，卑躬屈膝，盡量為

他开脫罪責，減輕處罰。例如美国联邦法官梅津在审理銀行財团經營非法貸款业务的案件中，不顾罪証确凿，而公开为銀行家的罪行辯護，結果該案在拖了六年以后，以撤銷案件而告終。在对共产党人、革命人民实行司法迫害时，資產階級法官更公开无耻地站在控訴一方陷害被告。例如，在最近希腊反動軍事法庭，以“間諜活动”罪名誣陷民族英雄格列索斯的审判中，“原告人”——檢察官所提出的捏造証据在法庭上被揭穿以后，法庭庭长仍然竭力支持檢察官的誣告，由于害怕这种偽証繼續暴露，竟非法地允許宣讀“原告人”书面証言，而不敢当面对质。在辯護人和“被告”証人揭穿这种陷害陰謀以后，法庭庭长在理屈詞穷之余竟大发雷霆，粗暴地制止辯護人辯護，对“被告”的辯護給以种种阻难。所有这些都說明，資產階級法官作为資產階級豢养的馴服奴仆，他們在审判中的活动必然是积极鎮压、陷害工人階級革命家和劳动人民，袒护剝削者，維護資產階級統治。他們絕不可能是超然的仲裁人，絕不可能是客觀公正、不偏不倚的。

在階級社会里，“公正”是有階級性的，只有具体的公正，或者是資產階級的公正，或者是无產階級的公正，而沒有抽象的純粹的“超階級的公正”。在資產階級所謂公正的东西，在无產階級看来正是不公正的。資產階級之所以把法官的階級偏私說成是“公正无私”，“不偏不倚”，正是要用这种虛偽的超階級的“公正”来掩盖对于劳动者的最不公平，以維持資本主义統治。

由此可見，資產階級法官的階級本质，同資產階級警察、檢察官是完全一致的。無論是前者或是后者，都是資產階級鎮压无產階級的工具，只是在实行鎮压的具体活动中，扮演不同的角色，起着不同的反动作用。資產階級檢察官是在“維護法制”的幌子下以追究“犯罪”的控訴人姿态出現，而法官則以“客觀公正”的正义維護者的偽善面目出

現，用审判處刑来最終实现其鎮压的任务。他們这种不同的作用只能說明在刑事鎮压上的分工合作，互相勾結，串通一气，絕不意味着他們对待劳动人民的根本态度不一致或是权力分立。尽管資產階級法官如何标榜“客觀公正”，而事实上他們对于作为資產階級代言人的檢察官和被陷害的劳动人民“被告人”絕不会是一視同仁的。相反地，法官总是千方百计地限制和剝奪“被告人”的权利，同檢察官站在一起陷害、鎮压无辜的人民。

我国是无產階級专政的国家。人民法院、人民公安、檢察机关是无產階級专政的国家机器，它們的共同任务是在党的领导下，依靠广大人民，通过各种职权打击敌人，懲罰犯罪，保护人民，保卫社会主义建設。人民法院主要是通过审判、懲罰刑事罪犯、解决民事糾紛来实现上述任务的。在刑事审判中，刑事罪犯絕大多数都是反革命分子、坏分子等社会主义的敌人，而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正是对他們实行专政的机关，因此，审判活动实质上是一场尖銳的敌我之間的階級斗争。在这个斗争中，人民檢察机关是作为国家公訴人，提出对罪犯的控訴，揭露犯罪；而人民法院則是在查明犯罪事实的基础上，依据党的政策和国家法律加以制裁。而且，人民法院还必须积极主动追查犯罪事实或犯罪人，而在个别沒有檢察院起訴和出庭支持公訴案件中，法院就更应兼負起檢察院追查控訴犯罪的职责。由此可見，在打击敌人的斗争中，人民法院是同檢察院分工合作，互相配合，一致对敌，而絕不是处于仲裁人的地位一旁觀战。人民法院同檢察院之間的关系是在党的統一领导下，在統一对敌前提下，通力合作，互相配合，分工負責，互相制約。因此，它們之間的具体职权不同只能說明它們之間的分工，这种分工的目的是为了更加准确地打击敌人。我們不能把这种分工看作是审判机关和檢察机关之間的分权，看作是資產階級国家中“彈劾式”关系。审判和控訴不但不

是截然分开的，而且是擰成一股繩的。如果把人民法院看作是超脫階級鬥爭的所謂“客觀公正”的“仲裁人”，宣揚控訴和審判的分立，就必然會麻痺人民法院對敵鬥爭的意識，阻礙法院和公安、檢察機關的協作關係，從而削弱了對敵鬥爭，有利於敵人。

三、資產階級“辯論原則”用虛偽的“當事人平等”和“有利被告”的“辯論”來掩蓋對於勞動人民的鎮壓和迫害。在我國，主張在刑事審判中搬用資產階級所謂的“當事人平等”和所謂“辯論原則”，這就是為社會主義的敵人爭權，就是反對無產階級專政。

馬克思主義告訴我們，在階級社會里，不可能有“階級平等”，地主不會與工人平等，飢寒交迫者不會與飽食暖衣者平等。資產階級宣揚的所謂“平等”，包括“當事人平等”在內，都是虛偽的。資本家和工人訂立工人出賣勞動力的契約時，表面上似乎是“平等”的，而在這種形式平等的背後則隱藏着資本家剝削工人的實質和貧富之間的極端不平等。資產階級法律形式規定了當事人在訴訟中的平等權利，但是資本主義國家的法律和訴訟程序繁瑣複雜，刁難人民，故弄玄虛。而無產階級，既不懂這些雜亂繁瑣的法律程序，又無錢去請索取高額酬金的資產階級律師的幫助，無錢去尋找和選擇証人，怎能去同僱傭“有經驗”的律師的工廠主、資本家“平等”地辯論呢？即使進行了“辯論”，而資產階級法官仍然根據資產階級的法律來鎮壓無產階級，對案件結局又有什么影響呢？而且，在現代帝國主義國家，對共產黨人、勞動人民實行司法迫害的刑事鎮壓，大都是由資產階級檢察機關提出“控訴”的。十分明顯，在資產階級檢察機關起訴的這些案件中，所謂當事人的“平等”更是徹頭徹尾的謊言。資本主義社會的檢察機關是資產階級對勞動人民實行專政的重要機器，檢察官是資本家的馴服奴仆，是勞動人民的凶惡敵人。檢察官和被陷害的勞動人民的“被告人”之間，在

動聽的所謂“雙方當事人”稱號後面，實際上存在着鎮壓者和被鎮壓者的關係。這裡根本不存在什麼“平等”。檢察官可以利用資產階級政權所提供的一切權力，利用逮捕、拘留、起訴、偽造假証人以及向法院提出嚴厲刑罰的要求來迫害勞動人民。在很多資產階級國家（如法國）還公開地明文規定檢察官在審判中享有“被告人”不可能享有的許多特權，例如有權同首席法官共同制訂審查証據的程序，有權不通過法官而直接審訊被告人、証人等等。由此可見，正像資產階級平等是資產階級為着保留他們的剝削制度和他們的特權而對於群眾的欺騙一樣，資產階級訴訟中的所謂“當事人平等”也只是用欺騙性的漂亮口號來掩蓋司法實踐中資產階級的特權，掩蓋資產階級司法機關的階級本質。

在我們國家，正如前面所述，人民檢察院是無產階級專政的機關，檢察機關作為追究犯罪的國家公訴人，為了揭露和打擊犯罪，檢察機關有權進行各種偵查活動，對罪犯進行逮捕、拘留、審訊、向法院提起公訴，支持公訴。只有這樣，人民公安機關、人民檢察機關才能有力地揭露犯罪，打擊敵人。而人民法院對刑事案件審判的任務就是揭露、証實刑事罪犯的罪行，並加以懲辦；但反革命分子、壞分子，由於其反動本質及妄圖逃避懲罰，會施展種種陰謀詭計來反對檢察機關的公訴和法院的審判，因此，不難理解對於反革命分子、壞分子所進行的審判，這就是對敵人實行專政的面對面的尖銳鬥爭。在這個鬥爭中，如果像有的人所主張的“讓被告人有和人民檢察機關平等的權利”，讓他“自由地”發表反動言論，歪曲事實和政策法律，只能意味着給這些敵人送盾牌和武器，好讓他擋住人民法院和人民檢察院對他實行專政的火力並進行反攻。因此，主張在我們的審判工作中實行資產階級辯論原則，實質上就是為反革命分子、壞分子爭權利，為他們開脫罪責，實質上就是反對無產階級專政，這是顯

而易見的事。

有人以被告人有辯護權來論證被告人有權在審判時同檢察機關進行辯論，主張在我國實行“辯論”程序。這實際上是以資產階級的所謂“保障被告人辯護權”的原則來歪曲我國法律上規定的“被告人有權獲得辯護”的審判制度。

我們知道，資產階級司法中的被告人辯護權是一項虛偽的制度，資產階級用它來宣揚點綴資產階級司法民主，但是，在實際上，資本主義國家中受鎮壓的“刑事被告人”一般多是共產黨人、進步人士和勞動人民，他們是資產階級國家專政的對象，也就是資產階級司法機關千方百計進行迫害的對象。因此，資產階級司法機關本質上是鎮壓“被告”，而決不是保護“被告”的。資產階級在法律上規定了“被告人”有“辯護權”以及“辯論程序”，是為了欺騙勞動人民，造成一種似乎資產階級法院是保護“全民”利益的假象，以麻痹勞動人民的階級意識。這對於資產階級來說，可以利用其“辯護權”和“辯論程序”來勾心鬥角，為開脫其罪責打開方便之門。而對於勞動者來說，實際上“辯護權”也罷，“辯論程序”也罷，只不過是形式主義走過場。因為，最後的生殺予奪之權，仍是操在其司法機關之手，對勞動人民的鎮壓來說並不發生什麼影響。何況資產階級法官還總是想用種種辦法公開地限制和取消“被告人”的“辯護權”。在帝國主義反動中心的美國，使用了種種方法來限制辯護：如對個別堅持正義的辯護律師進行威吓，革除其律師職務，或以“藐視法庭”為名監禁，甚至以卑鄙無恥的手段暗殺進步律師。例如為羅森堡夫婦辯護的何利寧律師就是被美國特務機關迫害致死的。上面只是就資產階級還保留了審判的形式實行鎮壓的場合而說的，至於在目前帝國主義國家越來越廣泛採用的警察、特務的法外制裁、秘密審訊、暗殺活動中，連資產階級辯護權和辯論形式的一點殘余都不存在了。

那末，在我們國家，“被告人有權獲得辯護”的規定的實質和意義究竟是什麼呢？

我們知道，我們的一切偵查、檢察和審判制度都是政法機關用來打擊敵人，懲罰犯罪，保護人民的有力武器，憲法和人民法院組織法上所規定的“被告人有權獲得辯護”也正是這種制度之一。我們認為：這個制度規定在法庭審判中允許刑事被告人（犯罪分子）在不違背政策法律，不歪曲事實的前提下，為自己進行辯護。這個規定的意義在於，通過審訊和犯罪人的辯護，進一步審查証實犯罪人罪行，通過其辯護考查犯罪分子對其罪行認罪的态度，有助於我們確定對他的處罰。總之，規定“被告人有權獲得辯護”的唯一目的，是為了更加狠、准、穩地打擊敵人。

在這裡，還應該明確的是：決不能把我國1958年司法大躍進中所創造、發展的法庭審判與群眾辯論相結合的審判方式與資產階級的“辯論原則”混為一談。我們知道，法庭審判與群眾辯論相結合是審判工作具體體現和貫徹專門機關工作與廣大群眾相結合的方針的一項好經驗，它指的是：在刑事案件中，根據案情需要，法院對罪犯的審判要與群眾對罪犯的揭發、批判、鬥爭相結合，而在民事案件中，則法院對案件的处理與群眾對當事人的調解、說服和批評相結合。這樣做是為了在審判工作中更充分地依靠群眾、發動群眾，以便更好地揭露犯罪，打擊敵人，保護人民，教育人民。因此，在刑事案件中，法庭審判與群眾對罪犯的揭發、批判相結合，是意味着人民法院和檢察院依靠群眾對敵人實行專政，進行不調和的鬥爭。當然，在審判過程中，也允許犯罪分子進行辯解，但這種辯解完全不能和人民內部的辯論等同起來。

綜上所述，資產階級國家刑事訴訟中的“辯論原則”是一項極其虛偽的原則，是資產階級用以掩蓋自己反動本質，欺騙勞動人民，維護資本主義統治的工具。它和我國社會主

（下轉42頁）

和平共处五項原則的进一步发展

——祝中緬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約、中緬关于两国边界問題的協定的簽訂

立 平

正像我国人民最初所预料的那样，中緬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約、中緬关于两国边界問題的協定的簽訂，必将受到中緬两国人民的热烈頌揚，并将获得亚洲人民以及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的广泛称頌，而仅仅不为一小撮帝国主义者及其附屬势力所乐聞。实际情况正是如此。这两个重大文件甫經簽訂，中緬两国人民和全世界一切善良的人們由此益发深信：由这个条約和協定光輝地体现出来的和平共处五項原則的偉大力量，不仅无损地保持着它的光澤，并且益发有力地现实国际生活中發揮着它的巨大的影响作用。

中緬两国同是和平共处五項原則的倡导者。我国政府和人民一向珍視五項原則，信守不渝。这些年来，我們高兴地看到，以五項原則为基础，中緬两国的友好关系，已取得大的发展。現在，我們两国为进一步巩固两国之間的友好关系，并解决存在于我們两国之間的由历史遗留下来的边界問題，而簽訂了这个条約和協定，这是信守五項原則的两个国家誠摯合作以維護两国善邻友好关系中的完全合乎邏輯的发展。

中緬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約是中緬两国进一步以法律形式維護、发揚和平共处五項原則的重大发展。这个条約說明了中緬两国政府的崇高意願，是为保持两国之間的“持久和平和亲密友誼”，“深信加强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緬甸联邦之間的睦邻关系和友好合作是符合两国的切身利益的”。这充分表明了这个条約的性质。这是一个和平、友好、互利的条約。条約的第一条規定：“締約双方承认和尊重彼此的独立、主权和領土完整”。我們感到

十分有意义的是：这条規定不仅在于共同确认了这条庄严的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而且还在于确切地反映了我們两国关系的现实，我們两国之間一向就保持着这种承认和尊重。我国的政府和人民是坚持执行和平政策、热爱和平的政府和人民，我們異常珍視我們的独立、主权和領土完整，我們也異常懂得并在事实上真誠地承认和尊重我們的邻邦及其他国家的独立、主权和領土完整。一切帝国主义者及其走卒所捏造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强大发展将会威胁它的邻邦的独立、主权和領土完整的謠言，不仅是为了挑撥若干亚洲国家和中国之間的睦邻友好关系，而且还在于以此欺騙这些国家加入受其控制的軍事集团；帝国主义者这种阴谋才是威胁这些国家的独立、主权和領土完整的真正危險。

条約的第二条規定：“双方保証用和平协商的办法解决双方之間的一切爭端，而不訴諸武力”。这是維護和平共处的一項主要原則。中緬两国都是爱好和平的国家，两国人民一向友好相处，互相視為亲戚，我們两国人民共同珍愛着这种亲切的关系，我国政府和人民更将这种友誼視為傳家財富。我們两国人民都要求在持久的和平环境中来建設我們的国家，以改变由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掠夺和压迫給我們造成的貧困状态。我們有一切理由以和平协商的办法来解决存在于我們两国之間的一切爭端，而不訴諸武力。我們更其感到欣慰的是，在我們两国之間以和平协商办法解决两国之間的一切爭端，已不仅是一种良好的願望，不仅认为有充分可能，

而且我們已經友好地有效地履行着这条原則，树立了堪足作为国与国之間以協商方法解决一切爭端問題的范例。我們考虑到这一切，特别是还有今后日益增进的相互同情与了解，这就使我們对这条規定怀有充分信念。

条約还規定：“双方保証互不侵犯，不参加针对另一方的軍事同盟。”这条規定极为国际輿論所重視，不同立場的輿論，鮮明地表現了不同的态度，显示这条規定有着重大的意义。我們高兴地看到，一切真正爱好和平、真誠拥护和平共处五項原則的輿論都对这条規定給予了肯定的評價。众所周知，帝国主义者，特别是美帝国主义者，为推行其侵略亚洲的目的，其恶毒手段之一，就是在亚洲各国之間进行挑撥，制造对立，以遂其“以亚洲人打亚洲人”的卑劣阴谋。中緬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約明确地規定了双方保証互不侵犯，不参加针对另一方的軍事同盟，这对巩固中緬两国的友誼，加强两国間的团结合作，具有极大的意义。

条約还規定，締約国双方将本着友好合作的精神，按照平等互利和互不干涉內政的原則，发展和加强两国間的經濟和文化联系。中緬两国人民已有充分的經驗来認識这条規定的积极意义。我們两国都迫切地需要发展自己的經濟、文化事业，以造福人民。中緬两国作为近邻，历史上的联系，现实生活的需要，都促使我們在爭取发展自己的經濟和文化事业上，要进一步实行友好合作、相互帮助。我們庆幸近若干年来我們已經富有成效地发展了我們两国之間的經濟联系和文化交往。以此为基础，我們深信，在此中緬友好关系的新阶段，这种联系必将获得进一步的发展。統察这个条約的全部規定，足見这个条約是完全符合中緬两国人民及亚洲和平的利益的。这是和平共处五項原則发展的新成果，是和平共处五項原則生命力的新体现。

在和平共处五項原則的指导下，在中緬友誼进一步增长的基础上，两国政府所簽訂

的中緬两国关于边界問題的协定，为最后地全面地解决由历史遗留下来的边界問題，鋪平了道路。它对巩固和进一步发展中緬友好具有重大意义。由这个协定所确定的解决边界問題的指导原則、成立联合委员会的决定以及两国政府达成協議所采用的以和平協商方法解决爭端問題的途徑，都为在亚洲国家間合理解决边界爭端問題树立下可貴范例。

协定的第二条規定了解决两国国界北段全部未定界的明确的原則，以及中段部分和南段部分的划界与定界的原則；协定中的这些規定，使中緬边界的現存問題都获得了原則性的解决。有了这个新基础，再經過双方繼續进行友好的協商，人們可以指望，由历史遺留給我們的边界問題，将在这中緬团结友好的新时期，获致公平、合理、互利的彻底解决。

中緬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約和中緬关于两国边界問題的协定的簽訂，又一次向人們有力地証实：共同倡导了和平共处五項原則的亚洲国家，应该并完全可能以友好協商的办法，和平地而又公平、合理、互利地解决国与国之間的一切爭端問題。如謂不然，人們不禁要問：既然在中緬之間已經做到了，并且是做得这样好，那末，为什么在其他方面不可能？正直的人們完全可以看到，这个条約和协定的簽訂，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坚持和平共处五項原則，坚持不懈地执行和平外交政策的重大成果。当然这也是与緬甸政府遵守五項原則的态度及其所作的相应的努力分不开的。这个事实，使那些一派污蔑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平外交政策的胡言乱語不攻自破。人們兴奋地看到，这个条約和协定的簽訂，已大大鼓舞了亚洲各国人民，益发增强了他們对于和平共处五項原則、对于以友好協商方法和平解决一切爭端問題的信心，并由此产生了巨大推动力量，这个力量将促使信守和平共处五項原則的亚洲各国，友好地和平地解决在它們之間尚存的一切爭端問題，从而使这些国家間的友好关系得到巩固和发展。

坚决反对美日反动派进行军事勾結

中国政治法律学会致电支持日本人民斗争(电报全文)

日本阻止修改日美“安全条约”法律家会议并轉

日本阻止修改日美“安全条约”国民会议:

我們代表全体中国法律工作者坚决支持日本人民和日本法律界人士,在岸信介去美国签订日美军事同盟条约的前夕,所发动的第十一次反对修改和争取廢除日美“安全条约”全国統一行动。

日美“安全条约”不仅違反了日本人民的意志和利益,同时还粗暴地破坏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同盟国之間締結的一切关于战后日本应走和平民主道路的国际协定,違背了世界公认的国际法的和平宗旨。象这样一个既違反国际义务又不符合日本人民意志的条约,当然是完全非法的。

美帝国主义和岸信介政府加紧修改日美“安全条约”的目的是要結成以中国、苏联和亚洲各国人民为敌的军事同盟,使日本成为美帝国主义在亚洲进行核战争的军事基地和帮凶,以便进一步向东南亚进行侵略扩张。这不仅把日本民族重新拖上了战争的道路,而且也严重地威胁了亚洲和世界的和平。因此,尝尽战争苦难的日本人民为揭露和粉碎这一阴谋活动所进行的斗争,完全是正义的,它必将得到亚洲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和所有正直的法律工作者的热烈支持。

美帝国主义是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敌人,反对美帝国主义和岸信介政府締結军事同盟条约,反对日本軍国主义的复活,是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斗争任务,中国法律工作者对日本人民反对美日军事同盟和争取独立、民主、和平中立的正义斗争深为关怀,认为这一斗争不仅符合日本的民族利益,而且也是对保卫亚洲和世界和平的重要贡献。

中国法律工作者深信,日本法律界的朋友們在法律为和平与正义服务的旗帜下,将继续加强团结,同日本各界人民一道,把反对美日反动派进行军事勾結的斗争坚决进行到底,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英勇的日本人民。

中国政治法律学会

1960年1月13日

日美軍事同盟條約是對亞洲和世界和平的嚴重威脅

楊 越

日本首相岸信介，經過長時期的處心積慮和蓄謀策劃，不顧日本人民的堅決反對，不顧中國人民和全世界愛好和平的各國人民一再警告，終於在今年1月19日 and 美國政府以修改日美“安全條約”為名簽訂了日美軍事同盟條約。正如我國外交部聲明中所指出的：“這是日本反動派和美帝國主義互相勾結，準備新的侵略和戰爭，威脅亞洲和世界和平的一個極其嚴重的步驟”。蘇聯政府也向日本政府提出了備忘錄，指出這個條約嚴重地危害蘇聯、中國以及亞洲和太平洋地區許多國家的利益。

日美軍事同盟條約的簽訂，是適應美帝國主義的戰略需要，把日本納入了美國的侵略性的軍事體系之中，同時，它也標誌着日本軍國主義已經復活。在美帝國主義的扶植、鼓勵、慫恿和策動之下，日本軍國主義野心和帝國主義欲望對亞洲和世界和平的威脅日益明顯和嚴重了。

全世界人民特別是亞洲人民，不能忘記日本軍國主義所發動的侵略戰爭曾經給人民的生命和財產造成多么嚴重的損失。從二十世紀的三十年代到四十年代，日本軍國主義者在所謂“為了東洋的和平”和“大東亞共榮圈”的口號下，帶給了中國、朝鮮、越南、緬甸、印度尼西亞、柬埔寨、老撾、泰國、菲律賓、馬來亞和新加坡的人民以極大禍害，他們進行瘋狂的掠奪和滅絕人性的屠殺，使這些國家內被占領地區的人民遭受了空前的浩劫。僅以我國為例，由於日本1937年對我

國發動了全面的侵略戰爭，使得我國人民直接或間接死於戰爭的達一千萬人以上，財產損失估計達五百億美元。據戰後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判決書中揭露，在日本侵略軍占領了土地，結束了戰役以後，就任意對平民進行屠殺，並虐殺俘虜，強姦婦女，甚至解剖活人和吃人肉，屠殺的手段極其野蠻殘酷和駭人聽聞。中國人民和亞洲人民決不會忘記日本軍國主義曾經加給他們的暴行和禍害。就是日本人民也會清楚地記得日本軍國主義的血腥統治給他們帶來的災難，在戰爭中，日本青壯年陣亡和殘廢的達二百多萬人，平均每七戶中有一个人，另外，直接死於戰時轰炸的達五十萬人以上，九百萬人由於戰爭轰炸等破壞而流離失所。

為了使慘痛的历史不再重演，為了根除日本軍國主義，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戰時和戰後所簽訂的一系列國際協定，都明文宣示和規定了防止日本軍國主義復活，制止日本再次進行侵略的條款。1943年12月1日開羅宣言中說，盟國進行戰爭的目的，“在於制止及懲罰日本之侵略”。1945年7月26日的波茨坦公告更明文規定“欺騙及錯誤領導日本人民，使其妄欲征服世界之威權及勢力，必須永久剔除”。波茨坦公告和戰後1947年遠東委員會的“對投降後日本之基本政策的決議”中，都曾確定懲辦戰爭罪犯，戰後日本民主化，在軍事上，經濟上解除武裝等原則。波茨坦公告具體地規定，必須毀滅“日本製造戰爭之力量”；遠東委員會所通過對投降後日

本之基本政策的決議中明确指出应“保証日本不再成为世界和平与安全之威胁”，要使日本“尽速树立一民主和平之政府”，規定日本不得拥有战争手段，并应“完全消灭其軍部权力与軍国主义之影响，严格取締一切表現軍国主义与侵略精神之制度”。此外，远东委员会并通过了諸如关于摧毁日本軍需工业的決議、禁止日本軍事活动与处置日本軍事装备的決議以及其他有关文件。战时和战后的这些国际协定，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間同盟国家处理战后日本問題的准則，它也反映了飽受日本軍国主义灾难的人民的共同願望，这些协定的签字国，負有遵守这些国际法准則的义务和維護这些准則的庄严責任。應該說，如果簽訂这些国际协定的国家都能够真正地貫徹这些原則，都能忠实地履行所承担的国际义务，那末可以想見，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策源地之一的日本的軍国主义将被摧毁，日本人民走向和平、民主、中立的願望将会得到实现。

但是，从战后以来，美帝国主义一直破坏自己在战时和战后一度所承諾的国际协定，竭力扶植日本軍国主义的复活。在軍事上，早在1950年朝鮮战争爆发后不久，美国就开始明目張胆地武装日本；在經濟上，美国为了使日本的經濟依附于自己的軍事訂貨，从战后到1958年上半年給予各种名义的援助和貸款达三十八亿美元，并向日本进行大量軍事訂貨，这就为日本的軍火工业及其有关工业的发展，創造了有利条件；在政治上，美国一直破坏日本的民族独立，在日本領土上建立軍事基地和駐有大量軍隊，扶植日本反动派打击民主力量，日本軍国主义分子則依附美国积极进行复辟活动，美日反动派的勾結，正是互相利用、朋比为奸的强盗关系。

曾經被列为甲級战犯、为美国非法擅自釋放的岸信介，从1957年2月組成战后日本第十四届內閣，集中地代表了日本壟断資本的利益，它是日本从战后到現在历届內閣政

府最为反动、擴張野心最为露骨的一届政府。从岸信介上台以来，加紧和美国勾結，积极扩展軍事力量，坚持敌視中国和苏联，加强对亚洲进行經濟侵略。特别是在复活軍国主义和壟断資本向外擴張的活动上，更是十分昭著。目前日本武装力量不仅就人数和火力上都已經大大加强，而且在岸信介政府的主持、鼓励和慫恿之下，使日本軍国主义分子肆无忌惮地猖獗活动，軍国主义的野心和主張更加明目張胆。大批的日本軍国主义分子在日本軍隊中充当了高級指揮官和骨干，据調查，日本“自卫队”里三佐（相当于战前的少佐）以上的軍官中，旧軍人在陸軍中占49.9%，在海軍中占95.5%，在空軍中占64.4%。此外，还保存大量的旧軍人組織，这些軍国主义分子竭力鼓吹对外进行擴張和加速实行核武装。尽管日本軍隊的火力已經大大超过战前，尽管目前日本軍国主义已經复活，但岸信介本人并不以此为滿足，他在1月25日記者招待会上还說什么为了同社会主义陣营保持“力量平衡”，还要借助于美国的协助。他表示，国家的“基本方針是按照国家力量逐渐增强自卫队”。根据岸信介政府拟訂的从1961到1965年的第二期扩軍計劃，在1965年以前，日本将建立導彈部队和導彈基地，到1965年，日本的总兵力将增至三十二万人，軍費比現在增加将近一倍。岸信介甚至叫囂說，“我认为不能无視用力量均衡来保持和平的这种作法。放棄了武力也会有真正和平的时代还没有到来”。在岸信介的亲自带动下，一些軍国主义分子野心勃勃。东条英机的秘书、陸軍大佐服部卓四郎公然发表文章叫囂日本的“自卫队”不仅应装备雷达等武器，而且应装备带核彈头的導彈和进攻的潛水艇。日本經濟团体联合会会长石坂泰三叫囂“已經不甘心于今天这种在东南亚各国沒有特殊权益的地位”。

日本对外經濟擴張的矛头主要是指向东南亚国家，日本的壟断資本通过以賠償、貸

款、投資、貿易等各种手段向东南亚各国輸出資本，占領市場，掠奪資源，攫取財富。所謂戰爭賠償，正是為日本壟斷資本利用日本國庫以高價推銷劣貨的機會，個別賠償物資有比通常出口價格貴七倍者。在簽訂賠償協定時，日本政府總是要挾對方簽訂通商航海條約，迫使對方給予日本最惠國的待遇；同時，每個賠償協定，都附有“經濟合作”協定，以便進行資本輸出。日本“經濟學人”雜誌就曾說，日本對東南亞各國的賠償已經變了質，變成了壟斷資本利用國家資金向東南亞擴張經濟勢力的主要武器之一。日本向東南亞國家的貸款和投資也是日本進行經濟擴張的重要方式，截至1959年年底止，日本對外貸款和投資已達十二億一千七百萬美元，日本通商產業省還提出了設立由政府投資的“海外經濟合作公司”的建議，準備由日本政府在1960年度向這個公司投資一百億日元，並在以後五年中總共投資五百億日元。日本還準備參加美國策劃成立的“國際開發基金”組織，以進一步與美國勾結，掠奪不發達國家。在貿易方面，日本對東南亞國家的出口貿易進展很快，從1955年起每年平均增長一億美元，此外，日本對中東和非洲，對拉丁美洲的貿易出口額也有很大增長。日本政府是通過賠償，為出口鋪平道路，打下開辟出口市場的基础，再通過出口貿易和貸款、投資取得可靠的市場和超額利潤，進行經濟上的滲透。日本政府對外經濟擴張的侵略野心是十分顯而易見的，就是日本外務省1959年3月發表的第三號外交藍皮書也公開提出，日本需要在亞非地區建立像美國對拉丁美洲，英國對英磅區那樣的勢力範圍。可見，日本政府任何的賠償、貸款、投資貿易規劃，都不過是“大東亞共榮圈”的舊夢重溫的一種新形式而已。

日美軍事同盟條約的簽訂是日美反动派在困難加深的情况下，彼此來互壯聲勢的表現，美日反动派有着同樣的困難處境，也有

着同樣的反共反人民和敵視中蘇、熱衷於侵略擴張的同樣目的。就美國而言，戰後以來，美國到處侵略擴張，政治上日益陷於孤立，財政上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困難，為了擺脫這種困難，美國急欲在西方和東方扶植起西德和日本兩個軍國主義作為美國侵略的軍事體系上得力助手，並要他們為美國分擔一些財政上的負擔；就日本而言，儘管戰後日本經濟獲得了迅速但是畸形的發展，但是出口貿易和國民消費水平的增長，還較工業生產發展水平為低，因此，隨着日本生產盲目性的發展，日本的生產和銷售市場之間的矛盾愈來愈嚴重，愈來愈尖銳。顯然，在所謂日本經濟“繁榮”的背后，正在游蕩着“經濟危機”的陰影。正因為這樣，日本壟斷資本集團大力向外進行以東南亞為重點的擴張活動。日本為實現“大東亞共榮圈”的美夢，還需要借助美國的力量；為了積極加緊武裝、復活軍國主義、發展軍需工業、企圖實現侵略計劃，也需要加緊追隨美國，與美國建立軍事同盟。所以，日美反动派的結合是強盜之間的同盟，彼此都是以損人利己為目的。他們之間的關係是互相利用、各懷鬼胎、同床異夢、貌合神離的關係。當然，特別應該指出的是日本反动派在這一場互相勾結的強盜同盟中，充當了追隨美國、為美國火中取栗的角色，其結果將更使日本喪失獨立自主。

日美軍事同盟條約雖然美其名曰“共同合作和安全條約”，實際上充滿了侵略野心的條款。如條約第三條規定，締約雙方“將單獨地和互助合作，通過不斷的有效的自助和互助，以遵循各自憲法的規定為條件來維持和發展各自抵禦武裝進攻的能力”。這一條款所謂遵循憲法規定，不過是由于岸信介懼於日本人民反對修改憲法的壓力，而採取的欺騙手法。而實際目的，是為了更加明目張膽地促使日本擴軍備戰。據美國“國民前衛”周刊報導，日美軍事同盟條約要求日本以核武器進行裝備，以便進行有效的現代化戰爭。岸

信介本人也一再叫囂日本軍隊擁有核武器，並不違反日本憲法。條約第四條、第五條都規定，日本有義務保護駐日美軍，並將派兵出國。日本外務相藤山愛一郎在日本國會解釋說，如果駐日美軍遭到攻擊，日本也要還擊，並且說日本遭到進攻時有可能追趕“敵人”。他並且解釋，條約中所謂遠東的範圍是指“菲律賓以北，中國的沿岸，（蘇聯）濱海邊區等日本周圍地區”。他說，美軍可以出兵到“中國的內地或蘇聯”，甚至到“遠東以外地區”。岸信介更露骨地說，日本派兵出國也“並不違反憲法”，日本軍隊“可以在公海上出動”。由此可見，新條約規定了使日本承擔派兵出國、追隨美國進行侵略戰爭的義務是十分明顯的。岸信介在簽約以後答復日本記者時說，美國政府同意了藤山在國會所作的解釋。岸信介為了掩飾條約的侵略性質，在2月初答復日本國會質詢時，竟然聲稱條約適用範圍包括我國金門馬祖。條約關於沖繩島問題的議事錄，把沖繩島地區適用於第四條的規定，這實際上是以沖繩島作為一個鏈條，把日美軍事同盟和美蔣、美李和美菲條約的“共同防禦地區”連接起來，事實上形成了美國策劃已久的“東北亞軍事同盟”。所有這些充分表明了日美軍事同盟條約的簽訂，為遠東地區的和平帶來嚴重的威脅，這表明日本反動派的軍國主義野心，正被美帝國主義披甲授戈，引導它重溫“南進”的舊夢，作為美國整個侵略部署的一個組成部分。這樣，日本就成了遠東地區緊張局勢和新戰爭的策源地，而日美軍事同盟條約，正是日美結成軍事集團來向亞洲人民進行進攻和侵略的同盟條約。不論藤山所作的關於條約適用範圍的解釋和岸信介引証美國政府的意見，以及日美反動派在實際行動上的表現，都充分說明了日美反動派對亞洲和平的敵視和企圖重新侵略和奴役亞洲人民的野心，他們為了達到這個目的，竟然幻想以結盟手段，向亞洲人民和全世界人民公開地進行挑戰。

條約第六條規定了美國的陸海空三軍“被允許使用在日本的設施和地區”，附于第六項條款的“關於駐日美軍使用設施、區域以及它的地位的協定”，充分表明日本提供了服從於美國的侵略政策和戰爭部署的便利。

日美軍事同盟條約，雖然以“共同合作和安全”為名，但再也掩飾不了它的侵略實質，它所謂的“合作”，是強盜間的合作，它所謂的“自衛”性質也是為了掩蓋侵略的野心，事實上，沒有任何人在威脅日本，亞洲人民清楚地記得，日本軍國主義的侵略在過去總是從談論所謂“防衛”開始的。條約所標榜的“安全”是與廣大日本人民所要求的和平，完全背道而馳，反之，日本反動派所簽訂的賣身投靠的條約，更加使日本喪失了獨立自主；日本反動派倘或甘冒大不韙，悍然和美國反動派一起發動侵略戰爭，必將給日本人民帶來深災大難。正如蘇聯政府1月27日向日本岸信介政府提出的備忘錄中所指出：“日本卷入新戰爭的結果必然招致浩劫。現在，誰不知道：在現代火箭——核戰爭的情況下，幅員不大、人口稠密、外國軍事基地星羅棋布的整個日本，在最初幾分鐘就會遭到廣島和長崎的悲慘命運。”

日美軍事同盟的締結，表明了日本反動派在美國卵翼下，公然破壞國際間防止日本軍國主義再起的一系列規定，使日本公開地成為美國侵略集團的正式成員，甘願充當美國的侵略幫凶；也表明了美國背信棄義地完全撕毀了自己曾經簽署的一系列的莊嚴的國際協定。

美日反動派的進一步勾結，完全同國際形勢發展的方向背道而馳，完全違背了全世界人民維護和爭取和平的願望，也將使日本更加喪失獨立自主，把日本人民推向災難的深淵。因此，世界人民、亞洲人民和日本人民堅決表示反對日美反動派進一步勾結，堅決反對日美軍事同盟。全世界進步輿論嚴厲譴責日美反動派嚴重威脅世界和平和遠東和

平的行动。从这一军事同盟的开始酝酿之日起，日本人民就开展了反对修改日美“安全条约”、阻止这一军事同盟实现的斗争。从去年4月，日本的工人、农民、妇女、青年、学生、各界人士以及一切阶层中的爱好和平的人们，举行了十一次全民性的统一行动日，声势一次比一次浩大，队伍一次比一次壮大。岸信介本人也清楚地知道日本人民的愤怒情绪，以致在他动身赴美签约之前，不得不把预定的动身时间提前了十几个小时，在数千军警卫护下从后门溜到飞机场，这表明岸信介卖国是个“勇士”，但在人民的壮大声势面前只能是个懦夫。条约签订以后，激起了日本广大公众的更大愤慨和强烈抗议，并继续开展了阻止批准这一条约的斗争。日本共产党一直站在这些斗争的最前线，坚决团结全国人民为反对批准和争取废除这一条约奋斗到底。日本社会党书记长浅沼稻次郎也表示，“社会党要在国会中揭露新条约的战争性质，以便迫使政府解散国会”。在人民声势壮大、岸信介日益孤立的情况下，自由民主党内部派系斗争也更加表面化、更加激烈了。目前，日本人民的斗争正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我国政府外交部在今年1月14日曾经就

日美签订军事同盟条约问题发表声明，中国人民完全拥护我国外交部的严正声明，决心同日本人民、同亚洲各国人民一起，为反对日美军事同盟，保卫远东和世界和平奋斗到底。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认为，在美帝国主义大力支持下的西德和日本成为严重战争危险的两个策源地。对于这一点，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人民和国家，都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惕，并且经过各种努力，制止这两个国家的军国主义破坏世界和平。

美国和日本反动派，满以为勾结在一起，就可以有助于侵略迷梦的实现。但是，时代变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已经不是帝国主义为所欲为的年代；六十年代更是东风进一步压倒西风的年代。今天的亚洲各国，已经不是以前那样任人宰割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了，亚洲人民绝不会容许曾经祸害过他们的日本军国主义卷土重来。日本人民争取独立、和平、民主、中立的斗争尽管有可能经历一段复杂、曲折的过程，但终将取得最后胜利。正如我国外交部声明中所指出的：“不管美日反动派如何猖獗，他们奴役日本人民，威胁亚洲各国人民的罪恶阴谋是注定要失败的。”

(上接34页)

义制度、无产阶级专政的性质根本不相容。在我们工人阶级掌握政权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里，绝不允许用所谓“辩论原则”来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危害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政法界有极少数人主张“辩论原则”应该 是我国刑事诉讼基本原则之一，这是资产阶

级“自由”、“平等”、“民主”思潮的反映。其实质就是要篡改人民法院的性质和审判工作的方向，用资产阶级法律观点来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因此，我们必须在政法界两条道路两种世界观的斗争中，彻底批判资产阶级“辩论原则”，消除资产阶级法律观点的影响，加强无产阶级专政。

日本法律工作者訪华代表团归国声明

我們由二十五名法律工作者組成的訪华代表团，应中国政治法律学会的邀請，于8月8日从羽田（机场）出发到今天历时約一个月，訪問中国各地，增进了和中国朋友們的友好，今天全体成員平安地健康地归来了。

我們訪問的地方是北京、东北、武汉、上海、广州等地。

由于中国方面采取极其开放的态度，因此我們在各地，只要時間允許，就可以自由地看到新中国在工业、农业、法律等各个方面的真实面貌。

在中国从去年开始的大家称之为“大跃进”的生产上的飞跃发展，以及同它并进的大規模的建設，現在正在进展着。

这个发展和建設的面貌，称之为“大跃进”是合适的，是极为輝煌的跃进面貌。

例如，使北京的市中心也在几个月之間面貌一变的大建設，为了迎接十月一日的国庆节，正在进展着。

沈阳成了工业城市，在荒蕪了的鞍山，改造并建設了大的炼鉄厂。

还有，三年前完全是原野的武汉郊外，出現了以炼矿炉为中心的有着十个重要工厂和十万工人的大型鋼鉄企业；上海，由过去的消費城市轉变成了生产城市了。

我們还參觀了三个人民公社，这是一个新的政治形态，它标志着与生产力发展的同时而提出的中国革命新阶段。我們感到，农民在新的所有制下面，兴修水利、努力生产，即使对自然的災害，也正在大大地增强它的抵抗力。

我們惊叹中国建設的規模之大、发展速度之快。

勤劳的中国人民不論男女老少，心里都燃燒着对祖国的热爱和对劳动生产的热情，完全自觉地在实现着奇迹般的大量的增产。

我們作为法律工作者，訪問了法院、監獄、大学、法学研究所等等。我們认为，通过协商解决糾紛，犯罪的减少以及通过教育来改造人的成功等等，說明了这个跃进的內情。

不久以前发表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決議，表示要以兩年的时间完成第二个五年計劃的主要指标，也不是沒有道理的。

我們的所見所聞証实了这种发展的可靠性。

我們訪問了中国各地，接触到中国人民的真实的面貌，我們深切感到两点：

第一，中国人民对我們日本人民，到处都表示了真实的热情的欢迎和友好的态度，与此同时也表示了对于对中国采取的敌視政策决不妥协的严正态度。

第二，显示出中国人民对建設这个新社会的热情勁儿和以人民的幸福为第一的态度，例如，建設工厂先从建設工人住宅开始，可以断定地說，中国人民全都是衷心希望和平，对于战争和侵略他国等等完全不放在眼里。

我們代表团在北京会見了习仲勛副总理，习副总理和我們坐在一起，也向我們說：中国

对日本人民怀着由衷的友情，而且衷心希望和平；而对于敌视中国的政策和侵略干涉那是决不让步的。

我們有机会同以中国政治法律学会为首的中国法律界的許多朋友們进行了多次会談。在这里，我們确认：中国的法律工作者在建設社会主义上，依照着“法律为和平服务”这样一句中国話，深深地爱好和平，把法律工作者的任务的最終目标放在世界和平上，并且衷心希望（和日本的法律工作者繼續交流和加强友好。

根据我們看到中国的现实和接触中国人民之后所产生的两点感想，以及通过同中国领导者們和法律工作者的座談而得的确信，我們得出了一个結論。

这就是：首先，我們日本国民可以衷心信賴中国人民爱好和平之心和对日本国民的友好态度。

从而必須立刻停止愚蠢地把中国当作假想的敌国。

我們认为，很快地恢复日中两国的国交，这是两国人民的願望，也是符合两国人民利益的，而且这才是維護世界和平的一大关键。

現在，政府正在企图修改日美“安全条約”，在这个意义上必須指出，这是同世界大势、同日本国民願望相反的不明智的企图。

我們抱着以下的决心归国：我們將直接或間接地参加从这个月七日开始在最高法院进行的关于砂川事件的审理，并且竭尽全力，为維護第一审的公正判决而努力。

我們把这个审判的斗争作为第一步，今后誓为早日实现恢复日本和中国的国交，为促进日中两国人民的友好、加强日中法律工作者的交流和友好，为确保日本的完全独立和自由，和大家共同努力，以此作为归国声明。

日本法律工作者訪华代表团团长 长野国助

1959年9月4日

（編者注：該声明原載日本国际法律家連絡协会会刊1959年第13期）

国际民主法律工作者协会通告

——关于爭取大赦西班牙政治犯和流放者

九十位利馬法律工作者向利馬律師公會主席提出一份請願書，在這份請願書里面，他們宣布他們同那些正在向西班牙政府要求保障個人自由，取消特別審判以及大赦政治犯和被流放者的西班牙法律工作者是團結一致的。

該請願書全文如下：

利馬城 司法宮四樓

1959年10月26日于利馬

利馬律師公會主席

安德列·雷昂·蒙达尔班博士

下面署名的律師們要告訴您，以使您了解在西班牙內戰結束後二十年來，許多西班牙公民的悲慘情況。

這個問題最重要的方面是在於：根據威脅人們的安全的鎮壓性的法律及刑事訴訟法的某些規定而嚴重地侵犯了人權。

這些法律是在和平時期，賦予一些機構，如軍事委員會，以審判那些被懷疑為違反國家安全的公民的特別權力（1943年3月12日的法律）。上述法律把兩件事同等看待：一件事是軍事起義以及進行目的在於破壞國家、軍隊和政府當局的威信的傾向性的宣傳，一件事是合法地舉行反對派的集會、會議和遊行，這些權利在大多數國家中都是受到法律保障的。

軍區司令們用以審判的緊急時期訴訟程序（軍事法典第918到937款）許可取消基本的辯護權利，沒有選擇辯護人的自由；審訊時不給予任何保障；只給予幾小時的時間來準備辯護以及提供證據等等。在這種情況下，由於參加內戰而被定罪的數以萬計的犯人，在侵犯他們自由的監視制度下，目前還處在軟禁階段上。

十萬多個西班牙人，包括杰出的知識界知名之士如布拉斯·卡布雷拉、薩爾瓦多·德·馬達里亞加、希門內斯·德·阿蘇阿等，都流亡在外，他們表示願意在一條大赦法令的保護下回到祖國的合法願望。1943年3月2日的法律被用來對待這些受到政治沖動之害的人們，而這條法律自從1944年12月23日起便應該被看作正式廢除了，因為在這一天的刑法典正式生效。

我們並不是要干涉西班牙的內政，評定它的政治制度也不是我們的責任。然而我們是要對西班牙的法律工作者和律師們表示支持，從而完成同業們的責任，我們並且注意到馬德里律師公會一致地要求政府保證個人自由和宣布大赦政治犯和政治流亡者，並且取消特別審判權。

下面署名的秘魯律師們對於西班牙的同業們那樣的正義的請求表示支持，我們要求普遍地尊重法權，並考慮到世界人權宣言中的原則以及把我們各國人民聯繫起來的普遍的天主教思想。

因此，我們要求利馬律師公會向聯合國人權委員會發出上述內容的呼嘯，並且致函秘魯全國律師聯合會，以便秘魯全國律師聯合會可以以秘魯全體律師的名義向聯合國表達意見。

貝爾納地諾·雷昂·伊·雷昂

最高法院院長（已退休）；

喬治·巴薩德雷

前教育部部長，聖馬科斯大學教授；

拉法艾爾·阿基拉·杷艾茲

庫斯科大學前校長，前共和國參議員；

安里蓋·巴爾伯薩

共和國檢察長；

喬治·杜蘭托·皮尼約斯；

里奧波爾多·H·奧爾提斯；

哥德弗雷多·加西亞·雷當；

非德爾·薩拉特·普拉申科

聖馬科斯大學教授；

黛麗亞·代爾加多；

卡洛斯·阿爾貝爾托·伊薩吉雷；

曼努艾爾·拉巴爾德

全国律师联合会秘书，教授；
梅达尔多·M·雷維利亚；
拉烏尔·培納 教授；
威尔吉尼亚·雷昂·德·伊薩吉雷
秘魯人民党全国律师协会秘书长；
胡安·何赛·泰維斯·拉索；
乔治·瓦尔代斯·薩拉斯；
佩雷約·薩門納穆·魯宾；
吉列尔莫·加西亚·蒙突伐尔 教授；
艾斯基尔·拉艾密雷斯·諾佛阿；
安赫尔·博尼利亚；
卡洛斯·亚亚·E；
安赫尔·卡斯特罗·拉瓦雷辽；
吉列尔莫·莫龙·艾利翁；
莫艾賽斯·艾斯柯貝多；
阿奥古斯托·烏尔特阿加·巴利翁；
文賽斯拉奧·威利亚尔·蒙托亚；
乔治·麦尔卡多·哈尔林；
路易斯·吉耐·阿里斯塔；
何赛·薩門耐斯；
巴布罗·里貝罗；
尼可拉斯·梅薩·吉汉德利亚

銀行職員联合会及公共汽車統一工会的法律
顧問；

泰奥多罗·艾斯皮尔快塔；
莫艾賽斯·阿罗約·波薩达斯；
路易斯·I·穆尼奥斯·塔馬約；
安里盖·蓄·波尔梯利亚；
卡洛斯·瓦斯盖斯；
維克托尔·卡斯提辽；
奧拉西奧·桑切斯·奥尔梯斯；
阿尔弗雷多·艾尔莫雷；
R·庞賽·馬丁涅斯；
阿龙索·艾斯基維尔；
托馬斯·賽瓦辽斯；
奧斯瓦尔多·阿吉雷·莫拉雷斯
前共和国参議員；
哈費叶·阿尔伐·奥尔兰狄尼；
吉列尔莫·阿尔伐·加馬拉；
黑納罗·茹伊斯·維利亚；
哈費叶·阿罗·費魯；
非立佩·阿尔伐·伊·阿尔伐；
胡里奧·賽薩尔·金塔尼利亚；

西斯托·科艾辽·哈拉
共和国参議員，教授；
乔治·尤海尼奥·卡斯坦耐达。
共和国参議員，教授；
安东尼欧·罗德里盖斯·代尔·瓦利艾
共和国众議員；
薩突尔尼諾·杷雷代斯·馬賽多；
馬利奧·A·索立斯；
路易斯·塔瓦拉·伊·塔瓦拉；
劳拉·卡利艾尔·伊貝尔立科；
伊斯馬艾尔·雷阿諾·維拉；
賽薩尔·A·加尔維斯·卡德納斯；
佩德罗·瓦尔維尔德·C.；
米盖尔·巴尔特拉·卡維罗；
阿尔西比亚代斯·卡斯特罗·波拉斯；
何赛·馬利亚·烏加尔德·本万努托；
爱德华多·L·杷契科·S；
L·爱德华多·格拉維·V.；
吉尔貝尔托·伊諾何薩·特維斯；
A·莫艾賽斯·伐兰瑞拉·莫兰諾
前罗莱托高等法院院长，已退休；
胡安·E·契尔·M.；
A·爱德华多·瓦尔地維亚·R.；
爱米利奧·卡西那·里瓦斯；
曼努尔·馬利亚·瓦尔加斯·山坦諾；
胡安·布魯姆雷·Q.；
薩烏尔·N·阿雷連諾·哥麦斯 教授；
胡安·烏巴尔多·德·拉·克魯斯；
吉列尔莫·薩巴塔·洛薩达；
拉烏尔·貝浪·斯克雷貝尔；
罗穆洛·維达龙·曼里盖；
維散特·卡达科拉·米拉瓦尔；
維克托尔·K·塔泰西；
拉烏尔·佛罗雷斯·烏必；
伊儿赫林那·查瓦里·烏雷辽；
馬利亚·卡雷拉·德·瓦利艾；
艾斯特凡尼亚·奥尔提斯·維尔加拉；
奧諾里奧·維加·A.；
卡洛斯·基洛斯·里瓦斯；
阿尔逢索·瓦斯盖斯·阿雷塔；
古麦尔新多·盖拉；
卡洛斯·杷拉西奧斯·金塔那；
奧古斯汀·里奧斯·代尔加多。

国际民主法律工作者协会

执行局会议(记录摘要)

——北京, 1959年10月4日—6日——

出席人: 普里特先生, 貝尼德克先生, 比斯特里斯基先生, 張志让先生, 德岡先生, 費埃洛先生, 盖斯特先生, 戈爾謝宁先生, 平野义太郎先生, 庫德利雅夫采夫先生, 拉蒂菲先生, 馬祖尔先生, 諾尔曼先生, 沈鈞儒先生, 吳德峰先生, 姚仲明先生, 莫魯(爱露西)夫人。^① (以西文姓氏笔划为序)

議 程

1. 保卫民主自由
2. 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
3. 国际法問題
4. “現代法”杂志
5. 扩大协会在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活动
6. 关于“国际法学家委员会”的活动
7. 国际民主法律工作者协会第七届大会
8. 协会的领导机构
9. 1960年預算

会议开幕时由沈鈞儒副主席致欢迎詞, 在欢迎詞中, 他回顾了一下国际民主法协为和平、尊重人权和反对殖民主义所开展的活动。

普里特先生向沈鈞儒副主席致意。他感謝中国政治法律学会的殷勤和友好的接待。普里特先生說, 我們正处在世界历史的偉大时刻, 在这样的环境里, 协会应该最高度地发挥自己的責任; 面对着尚屬强大的和侵略性的敌对力量, 我們的責任是重大的。

保卫民主自由

保卫曼諾里斯·格列索斯

乔尔·諾尔曼先生回顾了一下, 对于这个案件, 国际民主法协已經起了偉大的群众运动的組織者和联络机构的作用; 成立保卫曼諾里斯·格列索斯国

际委员会, 出版一本小册子說明格列索斯的生活和揭露被用来迫害他的法律, 对希腊使館和反对迫害格列索斯的各种組織采取各种步驟, 派遣国际委员会代表团赴希腊参加格列索斯英雄行为的周年紀念。

其后, 派遣了观察員旁听审判, 他們的亲自見証的报告已由上述国际委员会发表, 并且广泛地在报上轉載。召开了一次国际法律工作者会议, 它的結論同样地已經分发。召开过多次报界会议。出版了一期国际民主法协公报, 其中包括这次运动的主要文件。

在許多国家中, 法律工作者們对于扩大这个运动的基础作了許多貢獻。

目前的情况如下: 死刑的宣告已經避免了, 間諜罪的控告已經放棄了, 希腊反动派企图孤立希腊的民主力量的目的已失敗。希腊报界要求廢除特別法。在其他国家, 司法軍事化和法西斯化的傾向在审判該案件期間已被揭露。

① 出席人的职务及国籍: 普里特, 国际民主法协主席、英国皇家律师; 貝尼德克, 国际民主法协书记处书记、匈牙利法律工作者协会总书记; 比斯特里斯基, 国际民主法协书记处书记、捷克布拉格大学法学教授; 張志让, 中国政治法律学会副会长; 德岡, 国际民主法协财务长, 比利时人; 費埃洛, 国际民主法协副主席、巴西法律工作者协会会长; 盖斯特, 英国律师; 戈爾謝宁, 全苏法律研究所所长; 平野义太郎, 国际民主法协副主席、日本和平委员会理事长; 庫德利雅夫采夫, 国际民主法协副主席、全苏法律研究所科学委员会委員; 拉蒂菲, 全印(度)民主法律工作者协会委員; 馬祖尔, 波兰法律工作者协会主席; 諾尔曼, 国际民主法协总书记, 法国人; 沈鈞儒, 国际民主法协副主席, 中国政治法律学会副会长; 吳德峰, 中国政治法律学会副会长; 姚仲明, 中国政治法律学会书记处书记; 莫魯(爱露西)夫人, 国际民主法协执行书记, 法国人。——本刊編者注

但是他被宣判重刑。保卫曼諾里斯·格列索斯国际委员会于9月8日召开了会议，决定继续为争取格列索斯的释放而斗争，并且支持希腊律师们所提出的上诉。该委员会同时决定出版一本关于这案件的小册子，并且决定对希腊的囚犯和被流放者组织物质援助。

戈爾謝寧先生指出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参加保卫格列索斯运动的重要性。他强调国际民主法协主席和总书记以及各国分会所做的工作；认为当前提到民主法律工作者面前的有三个目标：（1）撤销判决，（2）废除特别法，（3）恢复在希腊的民主自由。

为撤销曼諾里斯·格列索斯的有罪判决，国际民主法协应向希腊最高法院提出意见。

吳德峰先生同意乔尔·諾尔曼的报告和戈爾謝寧教授的意見，中国政治法律学会认为，国际民主法协在这场运动中工作做得很好，为曼諾里斯·格列索斯而进行的斗争，同争取和平与民主的斗争是相互联系的，因为希腊政府迫害被告们的真正原因，是因为他们反对在希腊建立美国的军事基地。

德岡、拉蒂菲、平野义太郎、比斯特里斯基、貝尼德克、蓋斯特等先生先后说明各该国家开展的运动的特征。

执行局决定继续这一斗争，并且通过了一项决议。

法·赫卢的失踪

执行局通过了一项决议。它决定派遣两个观察员，最好是一位英国人和一位印度人，到貝魯特向保卫赫卢委员会调查情况，并申请许可前往大马士革。

国际民主法协支持成立一个保卫赫卢国际委员会。

在西德的侵犯民主自由行为

乔尔·諾尔曼先生：

尽管国际局势趋向缓和，但人们注意到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迫害现象日益加剧，特别对和平运动战士采取控告的方式和根据宣告德国共产党为非法的命令对共产党人采取控诉的方式。

争取撤销这项宣告德国共产党为非法的措施的运动已在德国开展起来。这个运动应该得到国际民主法协的支持，我们协会过去曾经成立过一个委员

会调查卡尔斯鲁厄案件，并证实禁止共产党的措施是非法的。

乔尔·諾尔曼建议：

1. 发表一个执行局声明；
2. 号召西方国家的法律工作者发表个人声明；
3. 请求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邻近的国家的法律工作者前往德意志联邦同德国法律工作者取得联系，并且探望被监禁的民主人士；
4. 恢复“审查卡尔斯鲁厄案件国际委员会”的活动。

大家展开了讨论。

最后，委托主席和总书记，在征询德国法律工作者的意见之后，采取最有效的行动。

执行局授权主席和总书记以执行局的名义公开发表他们认为对于下述案件是适当的一切的声明：关于迫害德国和平运动委员会、关于恢复德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和关于各民主组织及其拥护者经常遭受迫害等案件。

乔尔·諾尔曼先生提请注意：同样要支持西班牙、葡萄牙、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和美国的民主人士。

他唤起注意，从1959年10月到1960年6月这段期间，将有两个重要案件被提到美国最高法院进行审理。美国最高法院曾经根据1958年的判例，于1959年6月把美国共产党判为类似非法的组织。

大家环绕着一个关于保卫民主自由的决议草案进行讨论。

庫德利雅夫采夫先生认为，保卫民主自由是一个具有国际意义的问题，所以民主自由问题被写入联合国宪章和国际人权宣言之中。

在苏联的审判是公开的，对任何人，包括外国观察家都是开着门的。

执行局通过了一项决议。书记处授权把该决议区分开来以便把有关的部分寄给每个有关的国家。

此外，主席和总书记授权以执行局的名义在任何时候对任何国家发表他们认为必要的声明。

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

经过讨论之后，执行局通过了一项决议。

国际法問題

越南和老撾

普里特先生认为，老撾的局势应该看作是严重的。

执行局决定派遣一个調查团到現場去，就中包括一位印度人和一位英国人，要求进入南越和老撾以便研究那里的局势，同日內瓦協議所作的規定作一比較，授权总書記組織該調查团。

此外执行局通过了一項決議。

西藏

执行局通过了一項決議^①。

执行局决定出版一本詳細的关于西藏問題小冊子，并且揭露“国际法学家委员会”所分发的出版物的恶毒毀謗。

赫魯曉夫——艾森豪威尔会談和裁軍問題是兩項決議的对象。

“現代法”杂志

乔尔·諾尔曼先生就准备中的几期杂志的内容和杂志的分发情况作了报告。

一个征求訂戶的运动已經在开展，成千份訂书单剛剛分发出去，并且已邀請各国分会参加这一运动。

应该重視編委会委員們和文章的作者們无代价的劳动以及在某些国家所作的发行工作。

总書記提到編委会收到的信件，在这些信件中，不同国度的讀者們向他表示謝意，感謝杂志对他們的帮助，并且鼓励它在这条道路上繼續前进。

戈爾謝宁先生強調指出，該杂志在許多国家法律界当中所起的影响和它对于加强我們的組織所起的作用。

但是苏联分会希望編委会同协会执行局和書記处作更多的接触。

杂志的内容在最近几期中有了显著的改善。

杂志应该繼續討論和平共處問題的法律方面。它同时应该研究一下在現代的社会里法律工作者的作用。

苏联分会已决定就这个杂志組織集体討論。

希望国际民主法协每一个分会都来关心杂志并且給它提供通訊員，至少一人。

比斯特里斯基先生认为，杂志也应该协助把社会主义各国的法律告知資本主义国家的法律工作者。

杂志应该成为同法律工作者群众建立联系的最好的方法。

杂志中刊載的文章已經越来越經常地在全世界法律杂志中被提到。事实上，尽管資本主义国家报纸想无視我們的活动，但由于我們的杂志有了相当高的水平，他們的法律出版物不得不考虑到我們杂志的存在。

貝尼德克先生強調杂志作为掌握在协会手中进行工作的工具的价值。

費埃洛先生提起巴西民主法律工作者协会出版的杂志轉載了我們杂志的許多文章摘要。他认为不必要出西班牙文版。巴西“現代法”杂志可以全部或者部分轉載关于土地改革专号。（指国际民主法协杂志 1959 年第二期关于土地改革专号——譯者）

庫德利雅夫采夫先生建議执行局通过一項決議，对編輯委员会的努力表示感謝，并且請求国际民主法协各国分会更多地关心杂志以及在写稿和发行上更积极地合作。

拉蒂菲先生认为杂志在最近一个时期有許多改善。

吳德峰先生认为总書記的报告是很令人滿意的，并且认为应该使編委会在它的工作中得到方便；杂志为协会的宗旨，特别是为保卫和平作了許多很好的工作。吳先生同意以上发言中所提出的建議，特别是庫德利雅夫采夫先生所建議的決議。

扩大协会的活动

亚洲

乔尔·諾尔曼先生提出国际民主法协同亚洲各国法律工作者联系的方向。

拉蒂菲先生指出，現在在印度（分会）的組織工作同現有的可能性是不相称的。印度幅員广大，造成組織工作上某些困难，但发展的远景，特别是有协会杂志的帮助，将是有利的。

平野义太郎先生強調指出，禁止原子武器和冲繩島問題是日本民主法律工作者主要关心的問題，他对于在加尔各答召开的亚洲法律工作者會議所通

① 此項決議見本刊 1959 年第 6 期第 14 頁。——本刊編者注

过的关于派遣一个代表团去冲绳岛的决议事后没有实现感到遗憾。

执行局正考虑组织这样一个代表团的的可能性。

吳德峰先生：

协会应该开展同各国法律工作者和法律工作者组织，甚至同那些还没有国际民主法律工作者协会分会的国家的法律工作者和法律工作者组织的接触。

中国法律工作者同日本法律工作者有许多来往，对此他们彼此间是满意的。

中国政治法律学会同样已开展同拉丁美洲法律工作者的联系，特别是由于1958年国际民主法协组织了一个代表团。

应该开展各国之间的这些互相访问。

中国政治法律学会可以写信给某些非洲国家的工会和妇女团体，以求同这些我们还没有直接联系的国家法律工作者接上关系。

总之，我们应该支持亚洲和非洲的民族运动。

非洲

乔尔·诺尔曼先生批评性地检查了我们对非洲的工作做得不够。

他建议1961年组织一个亚非法律工作者会议。

此外他还建议：

广泛地在有关国家散发执行局关于殖民主义的决议。

邀请一些非洲法律工作者代表团访问社会主义国家。

请一些国际民主团体协助扩大同非洲法律工作者的关系。

当非洲法律工作者提出法律问题的时候，应予以帮助，例如，关于法国海军检查开往非洲的商船的问题，可以就这个问题在罗马组织讨论会。

拉丁美洲

乔尔·诺尔曼先生略谈了国际民主法协同阿根廷、巴西、智利、哥伦比亚、秘鲁、委内瑞拉等国关系的情况。

他把阿根廷报纸最近发表的一篇文章念给大家听，它表明我们常常忽视了我们协会做过的工作及它的影响，或者是对此估价低了。

他提起注意，国际民主法协已被邀请派遣代表出席将于1960年1月在阿累基巴举行的第三届秘鲁全国律师联合会大会。^①

費埃洛先生介绍了巴西民主法律工作者协会的情况和它的活动，巴西法协目前正在筹备一个关于劳动法会议，这方面已得到巴西共和国副总统的支持。

巴西协会出版了一个2,000份的杂志。该杂志转载了国际民主法协杂志一定数量的文章。它可以全部转载下一期关于土地改革专号。

P·貝雷拉先生在巴西法律工作者代表团访问中国回去后写的那本书已出了好几版。

巴西协会趁苏联最高法院院长访问巴西的机会，宴请苏联最高法院院长，参加宴会的有各个法院的院长。

危地马拉的与会人士略谈了关于危地马拉民主律师们所追随的同国际民主法协一致的宗旨，国际民主法协危地马拉分会是在1954年暴力打击时期被解散的。他在考虑重新建立这个分会。他想，如果危地马拉年青的律师们有机会访问社会主义国家的话，这会有好处的。

关于“国际法学家委员会”的活动

普里特先生：

这个产生于一个依靠美国的金钱和影响、伪装成受人尊敬的间谍组织的团体，正采取狡猾的和有效的行动。这是法律方面的一个可憎恶的冷战工具。它同时用尽一切力量要摧毁我们的组织。

貝尼德克先生回顾了一下在匈牙利反革命事件期间“国际法学家委员会”所进行的紧张活动。他认为，我们对于这样一个用尽全力反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委员会应该采取极其严肃的态度来对待。

拉蒂菲先生：

“国际法学家委员会”的活动主要是反对社会主义制度，但它对于西方的自由同样是危险的。

它在印度进行的大力宣传，目的是要使社会主义国家的朋友们丧气，破坏印苏和印中的友谊。

“国际法学家委员会”出版的一本关于西藏的小册子，缺少1954年中印签订的条约，这提供我们一个机会，可以很好地揭露它在所谓客观的伪装之下所提出的材料的偏袒性。

蓋斯特先生指出“国际法学家委员会”是以中立

^① 该会议已延期。——本刊编者注

为名建立各国分会的，例如在英国，以讨论各种专业问题吸引了一些诚实的法律工作者。对于该组织进行与宣传的危险性如果过低地估价是错误的。“国际法学家委员会”的出版物所针对的每一个国家，应该把自己的出版物寄给国际民主法协，以后由它告知各国分会。

吴德峰先生同意以上的发言，特别是拉蒂菲先生关于西藏问题的建议。中国政治法律学会对于要写一本小册子恢复西藏问题的真相，愿提供一切必要的资料。

普里特先生建议：

1. 授权总书记找一个作者写关于西藏问题的小册子。

2. 委托一个分会去搜集“国际法学家委员会”的出版物，并且按照国际民主法协各个分会的希望进行分析。

乔尔·诺尔曼先生：

我们已经请我们的同事西舍地按我们杂志的意图就这问题写一篇文章，并且我们将问他是否愿意把这篇文章发展成为一本小册子。

国际民主法律工作者

协会第七届大会

地点

保加利亚法律工作者协会已答复同意书记处提出的关于大会在索非亚召开的可能性的问题，该地点已得到执行局最后通过。

时间

保留执行局华沙会议确定的 1960 年 4 月 19 到 23 日的日期。^①

议程

保留 1959 年 4 月在华沙通过的，后来 7 月在布达佩斯又通过的议程。

书记处准备向大会提出的报告

乔尔·诺尔曼先生建议在这个报告里讨论以下的问题：

1. 国际局势缓和的远景：裁军、共处、文化关系。
2. 保卫民主自由、社会主义法制。

3. 同各国人民为自己的民族独立而斗争有关的法律问题。

1. 关于在现代社会里法律工作者的作用的总结。

这些问题中的每一个都包含着国际民主法协过去的活动和它的工作的远景的材料。

请执行局成员把他们的意见告知书记处。

大会的宣传工作

请国际民主法协各国分会对它们能够接触的国家进行大会的宣传。

苏联分会方面自我推荐把该任务委托给最近几个月它将派遣出国访问的法律工作者代表团去办。

大会的财务

现在地点已确定，有可能制定一个准确的预算，等到从保加利亚法律工作者那里得到一些必要的情况后，财务长将把草案提出来。

协会的领导机构(略)

1960 年预算

执行局把预算问题转交一个小组会去讨论。

会议在总书记的一段发言后宣告结束，他感谢中国政治法律学会，感谢中国政治法律学会书记处第一书记吴德峰先生以及所有那些以完善的方法协助保证国际民主法协执行局代表团的工作得到顺利进行的人们。

他强调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周年纪念日，中国政治法律学会给予国际民主法协代表们享有的优惠权利。

张志让先生向代表团表示感谢和致意。

在代表团停留北京期间，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中国政治法律学会会长董必武先生接见了代表团。

董必武先生介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大跃进现阶段中所取得的成就，大家就当前局势的一系列问题作了自由和友好的交谈，董必武先生介绍完毕之后，普里特先生表示热烈的感谢。

^① 会议日期已改为在 1960 年 10 月。——本刊编者注

法律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新中国的劳动保护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部劳动保护局編 現已出版 定价：0.48 元

本书着重叙述了十年来在党和政府的亲切关怀和领导下，劳动保护工作的发展和基本成就，从而反映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辉煌成就的一个方面。

全书分三章。第一章以确凿的史料揭露旧社会厂矿企业劳动条件的恶劣状况；工人的安全健康得不到任何保障。第二章系统地叙述党和政府在恢复和发展生产的各个时期中，制定和颁布了各种有关劳动保护的法规制度，通过这些法规、制度的实施和一系列的劳动保护措施，改造了旧企业不安全、不卫生的劳动环境，以及随着生产的发展，从组织管理上、技术措施上加强劳动保护工作的做法和经验，并扼要地展示了当前厂矿企业劳动条件的崭新面貌，指出今后改进的方向。第三章重点地描述了改善井下作业、高温作业、粉尘作业、重体力作业的劳动条件和女工保护方面所采用的基本方法和成功的经验，并从新旧对比中，反映出解放前后在这些方面的根本性变化。全书通过具体事例以通俗生动的叙述，体现出党和政府对劳动者安全健康的无限关怀以及广大职工群众为创造良好的劳动条件所作出的巨大贡献。（附有插图七幅）

本书可供各级企业主管部门、劳动部门、工会组织、厂矿企业各级生产领导人员、安全技术人员、工程技术人员在劳动保护工作方面的参考；也可作为对广大职工，特别是新工人进行共产主义、安全生产思想教育的材料；又可供高等院校、中等专业学校劳动保护教学研究方面的参考；此外，并可作为对外宣传的资料。

工人职员伤亡事故报告规程手册 35.5.13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部劳动保护局編 3月份出版 估价：0.13 元

为了及时全面掌握职工伤亡事故情况，研究事故原因及规律，监督企业认真采取有效措施预防伤亡事故的重复发生，贯彻安全生产方针，国务院在1956年发布施行了“工人职员伤亡事故报告规程”，根据历年来执行中取得的经验和各方面的意见，为了更精确、及时、便利地报告伤亡事故情况，现经劳动部将报告事故的各种表报加以全面修订，重新发布实行。

编入本书的除国务院“工人职员伤亡事故报告规程”以外，还有劳动部和国家统计局为贯彻执行这个规程所发布的联合通知，劳动部负责同志关于执行规程的报告和六个表格式样、说明，共约2万字。本书为工业、交通运输业、建筑业、伐木业，地质、水利系统工程单位以及机械农场、农业机器站，企业部门、劳动部门、工会组织和政法部门必备的文件。